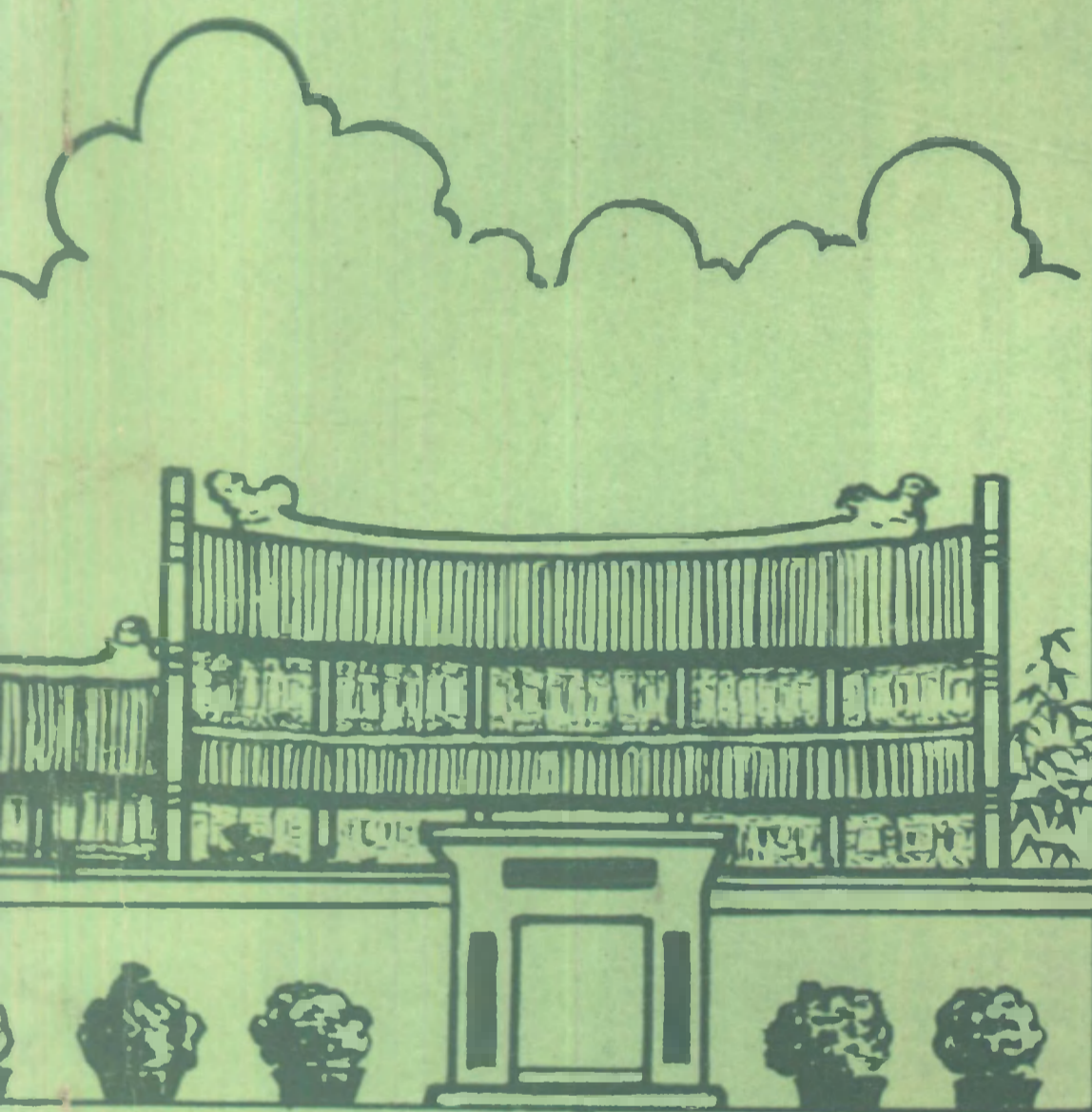


瑞安文史资料



R285.503.81 第七辑

H4

V.7

政协瑞安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壁中石石中書書中姓以千秋紀念我亦有人

湖上橋橋上真真樓臺廿載經營公真果敢考

此處向无桥梁清宣统元年吴君之屏创办德象女校以自费建筑此桥以便隔河学生往来遂咸

通里当时名曰憨桥予以憨字欠雅即融敢心桥三字于石去冬吴君又自出资建亭于桥上更为楼

为台皆以敢心为名予喜吴君果敢之心有造无己即以敢心二字分撰斯联並书数语以为纪念

中华民国十四年古历乙丑二月吉邑人七十三叟卧庐池志澂敬撰并书

瑞安仙岩圣寿寺佛陀池碑记

瑞安仙岩圣寿寺佛陀池碑记

全文载本刊第二辑（一九八四年）项骧撰 项廷珍书

目 录

- 全台游记·····池志澂遗作（1）
- 罗阳始建县治时间、地域、隶属小考·····宋维远（14）
- 瑞安藏书家·····杨作雨（23）
- 赵钧与《过来语》简介·····周梦江（31）
- 孙诒让论教育·····史拾遗（38）
- 人物小志·····王超六（48）
- 1、达官名宦与经学大师——张之洞与孙诒让·····（48）
- 2、“三千之中、视我犹子”——陈赓宸与马叙伦·····（53）
- 3、数学之乡师承佳话——洪彦远与苏步青·····（58）
- 4、教泽流芳高山仰止——伍叔饒与卢田孝昭·····（60）
- 5、饮水思源不忘其旧——金嵘轩与夏鼐·····（63）
- 九十年来·····林炜然（65）
- 古道热肠泽惠乡里·····沈肇瑞（76）
- 记我省早期铁路工程水利专家林大同
- 书法家项廷珍·····唐唯逸（82）

忆生物学界前辈诗人李逸伶……………许世铮（84）

献身科学、重视实验……………曾衍霖（88）

——悼念瑞安籍生物学家曾省教授

“七·七”抗战片断回忆纪要……………（91）

光绪二十二—二十八年
1896—1902年瑞安城内的学校摘自《浙江潮》

第四期《调查全稿》……………（99）

瑞安文人在外最近动态（续）……………（105）

王宝舆 应第四次亚洲流体力学会议之邀撰写论文

曾衍霖 出席第二届国际药物代谢学术会议

张树云 以版画名家在日本讲学并将举办画展

黄本诚 赴美出席国际真空学术会议

全 台 游 记

池 志 徵

编者按： 池志徵（1852——1937年）

字云珊，晚号卧庐。少时聪颖，好学深思。文宗退之，书流子贞，诗词清新，楹联巧思，留传人间，声望甚高。壮岁，光绪壬辰（1892）由沪乘斯美轮船渡海赴台湾，自北而南，而东，居台首尾三年之间，几遍迹全台，撰《全台游记》。凡“山川之扼要，人物之蕃昌，风俗时候之奇异，以及寮社险阻，民番雅处。古来方輿所未载，人迹所不及者，类皆记之。”在台，任抚幕四阅月。由友人张君任台北商务局总理，聘办铁路房事一年，又转荐任台东统管刺史胡公传幕府。甲午战争前归里。归里后，卖文鬻字行医为生，随笔云：“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都在别人家；不得不愁愁不得，凭栏依旧看梅花。”自嘲联云：“茅屋三间蔽风蔽雨，布衣一老卖字卖文。”遗著另有《沪游梦影录》《卧庐文集》及杂咏杂著等。

余少时读蓝鹿洲平台纪略、魏默深戡定台湾记诸书，谓台湾土沃产阜，耕一余三，可富可强，可战可守，辄慕然作海外之想。比长好游，周历数邦，然仍未至台湾。辛卯客沪，有同州友人备营北台，邀余同渡。遂自北而南、而东，三载之间，遍迹全台。山川之扼要、人物之蕃昌、风俗时候之奇异以及寮社险阻、民番杂处、古来方輿所未载、人迹所不及者，类皆记之。

是岁十月二十日，由沪坐斯美轮船渡海。申初开行，二百里天雾，泊鞍子岛。

廿一日雨，午霁，散步舵楼，回顾有岛重叠如列屏，舟人告余曰：“普陀山已过，入大洋界矣”。巨轮鼓浪，黑烟滚滚，大有乘长风破万里浪之意。快哉此行！

廿二早起，东南风，天气甚和暖。午初，见前面云雾中高山隐隐。舟人用远镜窥之，曰：“鸡笼山离此仅二百余里耳”。南洋风浪甚险，此行两日夜无颠簸，亦幸也。申正到鸡笼。鸡笼三面皆山，北面临海。山叠而雄，水缘而淡。满山草树。碧色如春，以地暖无霜雪故也。小划数十，望轮争飞，人气椎鲁，语气莫辨。余偕友人上岸沽酒，洋楼客栈，关关谊译，亦一热闹口岸也。

（原文缺页）

帆筒如林。由内江往沪美、鸡笼者由此上下。此间山水奇曲，大类我浙武陵、兰溪两处。若沿江数里，多设洋楼、密栽柳木，气象更霏雄也。他年台北大兴，其必先在此乎！

午正到沪美。沪美民居数千家，皆依山曲折，分为上、中、下三层街。中、下市肆稠密，行道者趾错肩摩，而上则树木阴翳、楼阁参差，颇有村居缥缈之意。由街西出二、三里即港，俗所谓淡水港是也。两岸南北皆山，中开大港，宽六、七里，水深三丈，两边暗沙围抱，轮泊须俟潮出入。此鸡笼以南咽喉也。港口旧有荷兰炮台。今外口北岸复新筑西洋炮台，甚雄壮。近又设水雷局、海关焉。

廿九日回府城。

十二月初二日，访友人于新竹。新竹即淡水厅旧署，昔所谓竹塹埔是也，离台北府城百五十里。遂复乘东路火车而去。十里至新庄；大村市，居民二千家，昔有县丞，今移驻艋舰焉。十里，坡角。十五里，龟仑岭；有街汛，两边皆山，火车上下、远望逶迤如蛇行。十五里，桃仔园；亦大村市，有城堡，山水清奇，田土膏美，满山十里皆红豆，晓风夕阳，裊裊可爱，姚硕甫台北道里记所谓江南道上行，即此处也。十里，坎子脚。十里，中枋；有汛市。换车焉。十里。头重溪。二十里。大湖口。一名粪箕湖。十里，风山崎；山甚平坦，两山相隔数十丈，下临大溪，有大桥横跨两岭。车过其上，俯视村落，夕阳满山，大有鸡鸣树间、犬吠云中之概。再行十五里为新竹，下车焉。

新竹昔时围竹为城，以避野番，故名竹塹。今则设官置治，画井分疆，气运大开，非人力所能遏抑也。自头重

溪、土耳其沟以南至大甲溪以北为县辖，即厅城为县城。风俗、物候与淡水同，而民秀过之。内负崇山，外临大海。滨溪设大甲巡检，其余溪港十余，总以吞霄。中港源流为长，惟水浅难泊巨舟，故仍必以沪美、鸡笼通互易焉。境内土地肥沃，人民沃衍，蓝鼎元东征集所谓台北民生之利无如竹塹，而二百年后竟著其盛焉。

在新竹二日，欲有事彰化。友人曰：“彰化在大甲溪南五十里，欲游彰化，先过大甲溪。溪广数里，发源内山，下多怪石。夏秋雷雨骤涨，骇流激湍，行人称天险焉。此时水平，或可涉筏”。出新竹西门五里。曰牛埔庄。三里，香山塘。四里，下寮。三里，盐水港。五里，老衢畸。五里，中港街，有汛。十里，山仔顶。五里，后垵街，有营，驻千总，稽查海口。宿焉。五里，乌眉港，五里，白沙墩。十里，吞霄街。八里，宛里街。二里，房里街，有城堡四门。约三里，房里，即猫里也。其山有猫里牛斗山，产矿油，甚大，昔从岩壁流出。又有玉山，亦在房里溪。山中晴霁，乃见峻岩峭壁叠白如银，可望不可即。相传前明郑成功自率步卒往，至山麓，遥隔一溪，毒甚，涉者多死，遂止。再行十里，大甲街。再五里，即大甲溪。余来时适逢阴雨，守溪二日，竟不得渡，溪阔多藤，溪人织草为席，名曰大甲席。复留溪一日，遂返新竹。在新竹又二日，仍坐火车至桃仔园，下车一宿，游大坵炭。

大坵炭在桃仔园北十五里，本野番出没之区，阔约三百里。此地开辟，可垦良田数十万亩，足置一县治，直通后山。漫山遍野皆樟，大者合抱，气甚芬烈，熬其质可为脑，

有脑寮，脑局在，岁出脑数百万，近设脑务总办理之。出鹿亦甚多。出大崙炭，仍由桃仔围坐火车至台北府城。

次日，复坐东路火车访友人于金沙局。局在鸡笼内山。距鸡笼北十里曰七堵、八堵，凡十里至暖暖、瑞芳，二十里内皆金山。山气磅礴葱厚，左右岩溪，溪水映日，流砂闪耀。每日淘沙者约数千人。溪中时有山人小舟、伐木作薪、载往舢舨者。满山奇花异草，绿阴缤纷，男女红辫绿衫，歌唱自乐，真仙境也。又闻八堵山为产煤奥区，近有华匠浚煤井、放西法以行之。又有硫磺产于金包里、冷水窟、大矿山、北投等处，距鸡笼近或二、三十里，远或四、五十里。皆为利源所在。台湾精华多聚于北路淡兰一隅，膏壤尤溢。是在官斯土者开其源耳。过此十里为三貂岭，入宜兰县界矣。三貂岭为台北第一高山，自麓至岭凡十里。当时岭路初开，草树蒙翳，仰不见天日。今则设关置戍，南逮苏澳，荒榛灌莽，几成坦途。

余在金沙局二日。出山由火车回台北府。遂入抚幕。在抚幕四阅月，有在沪友人张君经甫为台北商务局总理，邀余办铁路票房事。在商务局一年。

明年正月，张公转荐余于台东统营刺史胡公传幕府。张公曰：“后山多生番巢穴，地僻人稀，风瘴较前山为厉，君愿行否乎”？余曰：“当时之前山，亦今日之后山，有官司兵营以守之，何险之有”！

适有本局斯美轮船送澎湖镇、安平府回署，遂乘其便。廿二日由鸡笼上船。自鸡笼至澎湖约二百里，皆弱水，波涛险恶。是月幸无风。

廿三日黎明过澎湖沟，水势深凹，轮泊过此，必俟天明，东西阔百里，南北长数百里，文献通考所谓水至澎湖渐低、近琉球谓之落濑，想即此也。余从舟中远望，大小列岛星罗棋布烟波浩渺之中，自成天然位置。已正到妈宫澳。澳深数丈，左右各岛环列，中开一水，可出入巨艘。登高一望，外有西屿为之屏障，内有新城、龟山、蛇山相犄角。近于新城复筑炮台，更得控扼当关之势。夏秋台洋风涌险恶。轮泊多于此寄碇，亦好口岸也。列岛旧称三十六，而实则有名可纪者五十有四，最大除大山岛外则澎湖本岛。澎湖岛即妈宫岛，有妈宫街，妈宫城在焉。周岛七十四，居民二万，大半皆漳、泉人，东茅为屋以捕鱼，蓄豚饲鸡为生。物产不甚丰饶，米麦棉粟皆台厦接济，亦海外瘠土也。而地气温暖，四时皆夏，海风悠扬，亦不甚苦热。海畔多石花、铁珊瑚、海风藤。山间皆巨石，怒突偃蹇，奇块不可状，然质不甚坚，不可施椎凿也。康熙末朱一贵之乱，全台沦没，惟澎湖独存。国家以澎湖克而郑氏降，澎湖存而全台复，谓台澎形势全在澎湖，故移总兵驻其地，而实则澎湖虽非全台控制，而台厦之冲有此巨镇，果能设屯重兵，彼纵横海上者又安敢越澎湖飞渡而绝无顾忌耶。在澎湖一夜，次早仍由原轮赴安平。

澎湖至安平一百五十里，即前台湾县也。昔日安平镇，今改为安平县。同治十三年，海氛不靖，于安平之三鲲身造西洋炮台。郡港无内澳，鹿耳门昔可容巨舟出入，今已淤浅，改泊四草湖。安平巨浪滔天，夏初南风时尤剧，俗名曰“涌”，排击掀翻，响闻百里，天明即作，作时艘舶急驶澎

湖或旗后以避之，虽泰西人之善驾驶，语及安平口无不目震心骇，此可称天险也。轮船泊处离岸二十里，皆以竹排转渡。排中设木桶二，放行李、坐人，往往遇涌有坏事者。此来日丽风和，虽有浪涌，亦不见其可畏。午正上岸。

台南城大数倍台北，其街市之繁华、民居之稠密、百物之便宜亦数倍之，而地气太暖，风沙满目，水土似不及台北为佳。男妇老幼喜嚼槟榔，客来不奉茶，惟送槟榔。闾里诟谑，送槟榔数口即止。案槟榔即广东鸡心，粤人俟成熟取子而食，台人于未熟食其皮，合蛎房灰、浮留藤同嚼，可避瘴气。然三物合和，唾如脓血，亦恶习也。

次早过南门外，路值土人迎大王神，金鼓震地，香烟属天。问之，则曰：“大王池姓，闽赤岸人也；此间最著灵异”。余遂入庙展拜，慨想遗风。嗟呼！凡生有功德于民，没则祭以报功，义固然也。以我王事实虽不可考，二百年来，里社不没其馨香，其必当时有实德感人者深矣。余与王同一本，遂歆歔久之。

次早谒台南道顾公，遂留署。台南地土松浮，民气忙碌，似不若台北之平畴广壤。然帆樯鳞集，百物所聚，亦海外大都会也。台北多山，台南多水；台北多雨，台南多风。台北之土坚而红，故民风亦强而悍；台南之土皆沙，故民风亦流于弱。然草树鲜花、瓜菜茄豆，经年不绝，台南北皆然也。

在道署二日，欲访友人孙君巡检于大武壠。地在嘉义、安平分界之区，蓝鼎元集所谓通罗汉门阿猴林为南、屯二路之咽喉者即此。向作盗藪，故设巡检以驻之。次早出安平

城，迤东北行二十里，时已薄午，遥见马牛四来，百货交集，灌呼喧杂，道路为塞，余不得已导舆夫叱路而出，盖村民无巨市贸易，往往十里、二十里有地定期设市。而远近售商者率以期毕集，昔人名曰市集，然不仅台湾然也。入署见孙君，谈綦久，留三日，仍回台南道署。

查安平到台东，尚有九站山路。过凤山，即系番社，峭岭峻溪，险阻异常，非多队不可行。适胡公有饷船来在此，遂遣从人打发行行李上船，余自起轿陆行。十二早出安平城，南行二十里曰大湖。市镇甚阔。再二十里曰阿公店，大市镇，民居更稠密，有分司营汛在，惟风沙太厉，行路者目不能开，遂止焉。十三早，由阿公店二十里曰楠梓街，亦大市镇，数里皆楠木，故名，入凤山县界。是日适市人迎会，蛮女赭衣红髻，满插香花，络绎不绝，亦趣观也。过此二十里，皆沙漠不耕之地，两塘芦荻黑暗如林，当时最为盗劫出没之区。去岁，凤山令李公严杀数十人，此风稍戢。再行六、七里，为凤山县城，止焉。

由台北至台南，过大甲溪即无山，至凤山始有山，然亦不高。凤山城小而形势甚阔，东、南皆沿海，向称毒瘴恶地，官其邑者皆不敢至；今则民番杂处，商贾云集，亦台南之屏卫也。

十四日出凤山城，东行十五里曰林仔边，地甚秀腴，清溪环抱，绿竹茂美，有三吴风。所见妇女皆水眼小足，瘦韵嫣然。过此皆溪，隔一里则涉一溪，深者渡以竹筏。最后一大溪，焦石峻峭，水浪汹涌，猝遇暴雨，多嗟灭顶。过溪为东港，宿焉。此日仅行三十五里，不啻六、七十里焉，皆以

溪阻也。

东港居民数千，皆草户，大半捕鱼为生。凤山沿海诸港，半多壅塞，惟东港水深二丈，商船便于出入，故繁盛焉。此地出蔗糖，多贱售我温，以港口与温海对峙也。

十五日，两轿夫不肯行，遂止东港。是日适行李船到，丁哨官来见。午霁，步行海岸，见樯帆数隻，皆冉冉欲我浙行，令人起乡思焉。

十六日，由东港行约五里，遥望对峙海中有一岛，哨官曰：“此小琉球屿也，离此约六十里，岛中居民四百户，男女二、三千人，地不产五谷，以捕鱼杂种为生，恐宵小易于藏匿，近以屯兵守之”。案康熙时张给谏出使琉球记，谓由五虎门放洋过梅花所七日矣，今舵工上斗遥见东北一山，形圆卑如覆盂，四面无匹，心甚疑之；越日，因北风引舟南行，询之土人，则曰小琉球也，北去日本，东出弱水洋，当飘蓬莱、扶桑，不知何日西还。若是，则小琉球当此屿矣。再行十五里曰肖家庄。此地仅十数家，皆肖姓，然皆殷户，出来甚多。再行二十里为石头大营，即东州界，止焉。营官谭镇军以余统营幕府，即以官衔手版声炮饬队而迎。欲于次日上三条仑，谭营官曰：“去此数里皆番山险社，地僻人稀，非多队不能行。必须敝营先饬知各分棚以便派差伺候”。遂勉留一日。

十八早，谭营官即派哨官一人、洋枪队二十人、刀叉大旗对号各二人，护余上岭。十五里至归化门营。换队焉。又十五里至六义社营，又换队焉。又八里至大树前营，止焉。营官欧君曰：“自三条仑至此，虽峻岭，马轿皆可行，过此四

十里，凶岩峭壁，草木蒙茸，非番轿不能涉，故敝营半番兵焉”。十九日欧营官即备番轿一乘、番兵三十人，皆执枪矢以行。欧君复曰：“此去二、三里烟瘴甚厉，岁不见天日，六月非重棉不暖，公须含槟榔数口，以避氛焉”。番人每行数十步，辄长啸一声，作老鹏鸣，其声甚裂，群山皆应。复前行数武，见高峰数重，果皆壁立，番人屡以指语。不能轿，遂下轿攀援而上，屡涉屡仆，不得已复命两番兵挟掖而行。烟雾淋漓，十步之外不见人，鹿啼猿吼，远近俱闻，如是者十八里到大树林营焉。大树林十里，两旁皆合抱大树，树黑如山，人皆树中行，凶番往往匿此以枪矢杀人，月必数发。番兵过此，炮声不绝。屡以番语告人曰：“隔隔莫”，又曰：“麦溜溜”。隔隔莫，谓小心也；麦溜溜，谓快走也。再行十五里，为出水坡营，遂下岭焉。下岭较上岭愈险且峻，余既不能步，只得面山背坐，闭目任扛。八里为溪底营。溪底亦为番社最险之区。溪阔数里，冬春水涸可涉，秋夏飓风暴雨，往往漂人入海。两山石壁，皆作奇形。猴猿数百，见人不避。忽闻炮声，群焉升木，林树遂震震有声。有一哨兵告余曰：“数日前有凶番于此杀二人焉”。时日未暮，”阴风怒号，岩壁半黑，鸦鸟无声，余心悚焉。今晚遂回舍‘溪底营’。

出国 溪，九十里暮底营，四里皆海岸行，北风卷面，尘扬接舍天怒涛拍岸，倒卷如山。回视昨日所过诸峰，或雾或日，皆矗立万叠，不知昨日何以能过之。天地之色，至今日又为一变矣。十五里到巴郎卫。二十里到大竹篙，饭焉。又二十里到蛤仔仑。又八里到大麻里，亦大营，宿焉。

二十日，自大麻营复遵海而行，数里遥见野番数人，皆弃服佩刀、骑牛高啸而来，余心复惊。哨官曰：“此皆已抚之良番，毋虑焉。前途山麓东西，茅穴累累，皆其寮社也”。余自十八日上三条仑，披凶茸、历瘴毒，旁行四百里，上升崖悬，下坠壑智，夔不见人，至今日茅荒沙渚，始遇岛夷，则此行险苦可知矣。二十里到知本营。有番兵四人适杀鹿刺血而饮。李哨官留余午饭，遂煨鹿脯以待。饭后约行五里，遥见海中两屿对峙。哨官告余曰：“彼火烧屿也，纵横二十里，天清斯见，见者次日必大风；离此约六十里，居民五百余家，商船避风，间有至其地者。其一则红头屿也。此屿皆番族穴居，不知耕稼，以捕鱼、牧羊为生，形状无异野番，而性较驯。牧羊于山，剪耳为志，无争夺诈虞之习。民人贸易至其地者，携火枪至，则知其能伤人也，辄望然避之。语音颇类太西洋，然实莫测其所由。统岛周围约五、六十里，岛有高至六、七十丈者，而男女大小不及千人。光绪三年，恒春县周有基尝率船政学生至其地”。又行十里，则埤南大营焉。

埤南面山背海，土瘠砂飞，一州仅寥寥茅屋十数家，其余鳞比皆番社也。登高一望，茅芋盈丈，大海无涯，欲城、无可策之原，欲池、无可凿之水，欲田、无可耕之土，而并无可迁之民。当时原属生番荒岛、人迹罕到之区，同治十三年，因琉球漂风难民为此间凶番所杀，日本欲为复仇，而实则觊觎东州，朝廷始派大臣沈文肃讨之。沈公以海途风信靡常，轮舟不能停泊，始议山凤山、恒春凿山而进，其途凡三出，而总以三条仑为通衢，然亦左山右溪，鸟道一线，侧足

乃通。余甚怪当时官吏拔山通道，斩棘披荆，糜国家金钱数百万，仅开此三百里无益之岩疆，亦可为失计较矣。

入营见胡公。胡公勤核猛朴，吏治才也，而带兵用人，非其所长。所统五营，南至花莲港，西至三条仑，纵横五百里，分扎三十处，共二千而实不及千人。呜呼！海疆营制，坏不可言，而台湾更甚。良以兵弁皆山内地脱逃而出，非昏眊即流活，无营不缺额，无兵不烟癯。闻胡公之营犹较全台为可观。窃叹台湾孤悬海外，郑氏纳土逾二百年，向第有台湾、诸罗、凤山三县，彰化、淡水皆系后辟，自嘉庆中噶玛兰设官，且辟及后山矣，今则自苏澳、岐菜、秀孤鸾、埤南以逮琅玕、恒春，拔木通道，殫尽人力，几及千余里，容发僮耳雕蹄凿齿之民皆得沐浴圣化，此亦天时人事所不容己者也。然而筑炮台、制水雷、调驻楚粤营勇，费已不资，而祸患仍出于筹防之外，盖亦治之者不得其本耳。余尝谓台湾惟东州地瘠无可为，中南民气忙碌碌，犹如日之过午未归食者，而台北山川磅礴、隆隆然如初日之升，苟得其治，未有不日兴者也。而其大要在练兵、兴学、理财、开矿、垦田、呜呼！台湾虽海外一岛，然亦东南七省藩篱，昔人固多言之矣。故谓南洋之防莫先于防台，台湾不失则东南半壁屹若长城，台湾若失则沿海诸省岂遂保百年无事乎？余此行首尾越三年，计五百六十日，三府历其二、州一、十二县过其九，越重溪十二，步高山九重，雾涉奔沙者十数日，计行升二百里，亦平生未历之崎岖，然亦壮游也。遂记之。

罗阳始建县治时间、地域、隶属小考

宋 维 远

一、罗阳建县时间考

罗阳县是瑞安最早的县名。但罗阳始建县治时间却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始建于三国孙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提出此说的，有下列资料：

（1）、民国《瑞安县志稿·大事记和沿革表》摘引孙锵鸣《东瓯大事记》：吴王亮太平二年，以会稽郡东部为临海郡。统章安、临海、始丰、永宁、宁海、松阳、安固、横阳八县，此瑞安立县之始”。（笔者按：该段史实，在时间上有误，瑞安建县时先称罗阳、安阳，晋时才改安固、宁海、横阳均始建县于晋太康间因此临海郡统章安等八县在晋，並不是孙吴太平二年。以下括弧内均为笔者按。）

（2）、嘉庆《瑞安县志·沿革表》：“三国吴太平二年，罗阳县置县始此。”

另一说，认为始建县于三国孙吴赤乌二年（239），提供此说的，有下列资料：

（3）、《三国志·孙权传》（新版47卷1149页）：“太元元年（251）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吴录曰：罗阳，今

安固县。”

(4)、嘉定《赤城志》：“罗阳，吴赤乌二年析永宁县置之”。

(5)、光绪《瑞安县志残稿·沿革表》(手抄本，残稿，眉头经孙诒让手校)引《三国志·吴志》认为，罗阳县建于吴大帝赤乌二年。

(6)、民国《瑞安县志稿·凡例》：“本志断限，上起三国吴赤乌二年初置罗阳县治之年。(下小字)兹据陈芳绩历代地理沿革表校正。”

(7)、民国《平阳县志》亦认为罗阳县始建于赤乌二年。

(8)、雍正《浙江通志·建置表》：“吴赤乌中分乌伤置永康县”。“吴大帝分富春县地置新昌县。”“吴赤乌中分大末县地置平昌县。”

由以上两说，可能产生两说皆错的怀疑，从下列资料可予否定：

(9)、嘉庆《瑞安县志·沿革表》：“按旧志沿革表，(建县)始于三国吴时”。

(10)、雍正《浙江通志》引《宋书州郡志》，“安固令，吴立”。《方輿纪要》：认为罗阳县“三国析置”。

可见罗阳建县于三国吴时是没有异议的，正可作以上两说的佐证。

《三国志》是离罗阳建县时间最近的史书，《赤城志》又是台州较有权威的志书，加上《元和郡县志》等专著佐证，吴于赤乌时，单在浙江析县的就有永康，新昌，平昌等县，吴大帝刚立帝位，分置一批县治，也可作罗阳置县的旁

证。因此罗阳县始建县于三国吴赤乌二年是不必存疑了。而始建于“太平二年”之说，可能是以临海建郡，统罗阳县时间误为建县时间），故错。

二、秦汉时的会稽郡及东部都尉

要弄清罗阳县的地域及其隶属，还要先上溯秦汉时会稽郡的地域。有下列史料：

（11）、光绪《瑞安县志残稿》：《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方輿胜览》：瑞安府（南宋时，温州府曾一度改称瑞安府），秦属闽中郡。《明一统志》：温州府同。按：秦时，今温、台、处三府及福建全省并为闽中郡地，祝穆（《方輿胜览》作者·宋人。）说是也”。

（12）、雍正《浙江通志·建置》：“台州，《十道志》：秦属闽中郡。……按《元和郡县志》及《太平寰宇记》乃以为属闽中郡……在秦则属闽中郡，在汉则属会稽郡。意者，秦并天下，尽取瓯闽之地置闽中郡，汉封东越王，以王其地。及武帝平东越，尽徙其民于江淮闽，而闽中郡不复再置，第置冶县以抚其遗民。冶县既隶于会稽郡，而回浦亦为会稽郡之属邑，则是东越之亡，而闽中郡地已并入会稽郡，与元和志之说相应。汉既不置闽中郡，而以秦闽中故地置为冶县及回浦县，并属会稽郡，故秦三十六郡之中，既有会稽郡，又有闽中郡。《前汉书·地理志》第有会稽郡，而无闽中郡。此《元和郡县志》所书，所以有秦汉之异也。后人第见汉之属会稽郡，而不知秦之属闽中郡，当从《元和郡县志》书曰：秦属闽中郡，《通典》所书非是，今不取。”

(13)、《中国古代史纲》：秦王政 25 年（公元前 222 年）秦军占楚的江南地区后，东越和闽越的君长投降。秦先后在今苏南、浙北置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在今浙南和福建置闽中郡（今福建福州）”。

(14)、光绪《瑞安县志残稿》：“《汉书地理志》，会稽有二都尉，西部治钱塘。南部治回浦……《会稽典录》朱育（三国时人）曰：元鼎五年除东越，因以其他为治，而立东部都尉，后徙章安。阳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后徙句章。”“刘昭注《晋太康地理记》：（章安）本鄞县南之回浦乡，章帝章和元年（87）立”。（光绪《瑞安县志残稿》认为会稽东部都尉治“不在回浦则明甚”。依此条，章安本鄞之回浦乡，而朱育是三国人，此时回浦乡已称章安。与《汉书地理志》说法並不矛盾。但东部都尉治在章安时，已不再称回浦，只是名称上的差错。）

光绪《瑞安县志残稿》：《宋(书)州郡志》于晋建安郡侯官下云：后汉曰东侯官，属会稽。”是其证也。后汉曰东侯官，自是前汉之回浦。《宋书州郡志》：（东阳太守）本会稽西部都尉临海（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前汉都尉治鄞，后汉分会稽郡为吴郡，疑是都尉治治章安也。又云：东部临海是也，西部建安是也”。

(15)、雍正《浙江通志》：“《太平御览》：始元二年（公元前 85 年），以东瓯地为回浦县。《太平寰宇记》，后汉光武时改回浦为章安”。

(16)、嘉靖《浙江通志》：“始元二年以闽越地置回浦。治二县，属会稽郡”。

(17)、雍正《浙江通志》：“《汉书地理志》，钱塘，西部都尉治；回浦，南部都尉治。洪氏隶释……李字潏

《图经》曰，文帝时以山阴为都尉治，元狩中徙治钱塘为西部；元鼎又立东部都尉治。光武改回浦为章安，以治立东侯官。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以会稽南部为建安郡。”“杜佑《通典》，后汉改冶县为侯官都尉，分冶县为会稽东，南二部都尉”。“及会稽移于浙东，则西部亦属于婺州，回浦后改章安，乃会稽之东部，今台州盖其地，冶县则是南部，在吴属建安郡，在唐遂为福州”。

以上资料说明：两汉，三国时，以秦时的闽中郡旧地置冶县（元鼎五年——公元112年），和回浦县（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冶和回浦县的关系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不作考述）并置东部都尉（治所常有迁徙）属会稽郡。会稽郡先分东，西部都尉，后汉又以原东部都尉析置东，南部都尉，东部都尉治章安（临海），南部都尉治建安。到三国，东部都尉改为临海郡，南部都尉改建安郡。临海自东汉以来，就成了浙南的行政中心。罗阳未建县前，先属回浦，章安，（回浦改章安，章安后是临海郡治）后属永宁县，罗阳建县后，先属东部都尉治，后属临海郡，直至东晋。置永嘉郡后，才与临海郡脱离直接隶属关系。

三、临海郡、临海县的始建时间

罗阳县既然在一段时间内是临海郡的直接隶属。弄清临海郡的始建时间，与搞清罗阳县的历史至关重要。但临海郡、临海县、临海（东部）都尉三者的概念往往容易混淆。会稽郡，东部都尉，已在上节讲清楚了。至于临海郡，临海县的始建时间有两种讲法：一是先置临海郡，始建于三国吴大帝时；后置临海县，始建于三国吴太平二年（257）。一是先置临海县，始建于吴太元二年（252年）；后立临

海郡。兹将古籍提供的资料摘录于下：

(18)、光绪《瑞安县志残稿》引《三国志·吴志》：“孙亮太平二年，以会稽东部为临海郡”和《元和郡县志》：“吴大帝时以章安永宁置临海郡”两种不同意见，并认为二者都有根据，“而《吴志》与《宋书州郡志》同，仍依吴志为正”。

(19)、《雍正浙江通志·建置》引《太平寰宇记》：“吴大帝分章安，永宁置临海县。会稽王（孙亮）置临海郡。”《元和郡县志》：“吴大帝分章安，永宁置临海郡”。和《宋（书州郡）志》：“吴孙亮太平二年立临海郡。”两种不同意见，认为：《寰宇记》与《宋志》合，“缘《元和郡县志》以置临海县之时，即以为置临海郡，故有大帝，孙亮之异，当从《寰宇记》，分置县与置郡之事为正”。同书又引《通典》：“吴（大帝）太元二年分章安置临海县”。后按：“吴置临海县，寻立临郡，徙治于章安，以县属焉”。

(20)、雍正《浙江通志·沿革表》：“吴太平二年于县（指章安县）置临海郡，又分章安置临海县属临海郡”。“章安县。晋、宋、齐为临海郡治，梁为赤城郡治，陈为临海郡治；临海县，晋、宋、齐并属临海郡，梁属赤城郡，陈属临海郡。”“吴分章安县地置始平县，属临海郡。”（引《太平寰宇记》：吴初置南始于县）“吴始分章安县地置罗阳县。宝鼎中改曰安阳，属临海郡”。“永嘉县，后汉（时为）章安县地，永建时析置永宁县，属会稽郡。”同书又引“《后汉郡国志》：“后汉永和三年，以章安东甌乡为永宁县”。

(21)《椒江地名志，概况》（1988年版）：“据《海门志稿》记载，……三国吴大帝孙权（公元222年）

始改章安县为临海县……，吴少帝孙亮太平二年设临海郡”。

从以上资料看，清时人（指雍正浙江通志和光绪瑞安县志残稿编纂者）都以《吴志》、《寰宇记》、《宋志》的意见为正。即认为：吴大帝时分章安，永宁置临海县。《通典》认为具体时间是太元二年（252）。临海建郡时间则比临海建县时间晚一些，是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并指出其他书籍记载上差错的原因，是把临海建县与建郡时间混同起来的缘故。除此之外，本文还有几处引证资料，还应用于澄清。如本文资料（3），“初临海罗阳县有神”一节。是否可说明太元元年，罗阳县已系临海郡所属，便成为临海郡始建于吴大帝的旁证？我认为此证难以成立，因此处写：“临海罗阳县”并未加上“郡”字，临海可作为临海都尉解：罗阳、永宁都由章安析分出来，古人称“临海罗阳县”并不一定专指临海郡。至于嘉庆、民国瑞安县志把罗阳建县定于太平二年，此时临海郡已建，罗阳县属临海郡是无疑的。而吴志的作者已是东晋时人，记载时章安，临海没有说清楚，也在所难免。

四、罗阳县地域析置由来

罗阳县地域的析置由来，本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古籍的记载却亦有多种不同说法，也有必要考证。

（22）、雍正《浙江通志·建置》：“《太平寰宇记》，（东汉）永和三年（138）置永宁县。谨按，《宋书州郡志》一作永建四年（194）。《后汉书郡国志》，永宁，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

（23）参阅（20）条

(24)、光绪《瑞安县志残稿》：“宋志》及《十道志》並谓永嘉立于永建四年，与《续汉志》不同，今以续汉志为正”。

按以上资料可以归纳如下几组不同说法，並加拙见。

甲、永宁县始建于永建四年和永和三年两说，雍正《浙江通志·沿革表》认为置于永建时，光绪《瑞安县志残稿》则认为以《续汉志》说法的永和三年为正，我认为《续汉志》较有权威，似可相信。有待专家考证。

乙、罗阳县地析置也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从章定县地析置；一是从永宁县地析置。我认为，永宁置县时间比罗阳早，原罗阳县地与原永宁县地均系章安县之东瓯乡。永宁在罗阳正北，並毗邻，章安又在永宁东北，並毗邻。从地理位置与时间看，章安将毗邻的南部一块东瓯乡析置永宁县，却留下永宁的南面一块“飞地”仍属章安县；后来才把这块“飞地”析置为“罗阳县”。这种析置方法在我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是不符合情理的。加以又有《嘉定赤城志》：“罗阳，吴赤乌二年析永宁县置之”为证，前说显然是错的。不过，把古人所说的“分章安县地置罗阳县。”理解为罗阳县地过去曾是章安县地，尚可勉强说得过去。

丙、临海县地的析置也有几种不同说法。一是认为“改章安县为临海县”；一是认为“分章安县置临海县”；一是认为“析章安、永宁县地为临海县”。看来，《椒江地名志》引《海门志稿》：“三国吴大帝孙权（公元222年——原书注）始改章安县为临海县……”一说，建县时间上虽与其他志书符合，但该志于吴大帝孙权后注：公元222年，此年正是孙权称帝第一年，不知有何依据？雍正《浙江通

志》引《元和郡县志》：“吴分章安置南始平县”。与此就有矛盾，如孙权称帝当年，章安县已改临海县，此条便应是“分临海”而不是“分章安”了。又据本文（19），章安，临海两县在晋、宋、齐、梁、陈均同时并存，都属临海郡。可见“改章安为临海”，令人置疑。而应为“分章安置临海县”。至于临海是否由章安，永宁县地析置，从地理上看可能性是很大的，当时章安、永宁南北毗邻，两县之间析置临海，也是合于情理的。既有文字记载，应予置信。

五、全文结论

甲、罗阳县始建于三国孙吴赤乌二年（237）。

乙、罗阳未建县前，县地在秦属闽中郡，在两汉先属会稽郡（秦与汉的会稽郡已是二个概念）的回浦县（后改章安县）后属会稽郡的永宁县。

丙、罗阳建县后先属会稽郡东部都尉，后属临海郡，后又改属永嘉郡。

丁、罗阳县地是从永宁县地中析置，析置时与章安县地已不再相关了。

瑞安藏书家

杨作雨

读书人爱书，人之常情。古今中外，哪个读书人没几架几橱的书呢？，这些书，又必是个人所钟爱，所研读的“宝物”、或买或抄或借，日积月累，自然成堆。读书人是最懂得“开卷有益”的，身边手头有这么一堆书，或正襟苦读，或随便翻翻，或掩卷沉思，或枕书而眠，无不其意欣欣，乐在其中。即便如此，仍有“书到用时方恨少”之叹。

藏书家则不同，他们几乎把藏书当做人生最大的幸福，甚至当作自己的专业。近人称藏书家为“百家中特殊的一家”。想来也不无道理。有人“黄金散尽为收书”，这跟“千金买醉”者就大异其趣；至于“输钱吴市得书夸，道是西施入馆娃”，其得书之乐，竟胜过美人入抱。为了藏书，他们起华屋，筑层楼，比起自己的住宅居室来，还要考究得多。古有“金屋藏娇”之说，如果套用一下，说藏书家是“金屋藏书”者，大概也不算过份。两者相较，雅俗之别，有识者自能区分。

清代藏书家丁丙，名其楼曰“八千卷”；陆心源的藏书楼，雅号“皕宋”。前者以皮藏之富而自鸣得意；后者以版本之珍而夸炫当世。这种心态，常人颇难理解；而这却正是

藏家书异于常人的“特殊”心态。

历代藏书家知多少？不讲全国，单说浙江，据历史学家吴晗初步统计，自晋至清，有名可稽的计三百五十九家，著名藏书楼一百八十多处；瑞安“玉海楼”，也是其中的一家。

是不是瑞安的藏书家、藏书楼只此“玉海楼”一家呢？

陈虬尝慨乎言之，瑞安“鲜藏书家”。如果与宁、绍、杭、嘉、湖相比较而言，那是事实。一邑之冠的“玉海楼”，若跟“天一阁”相比，也未免逊色。究其实，还是孙延钊说得对。他说：“勿以瑞邑藏书，尽于玉海楼。”瑞安并非“鲜藏书家”，只不过“鲜为人知”而已也。

宋代的陈傅良，难道不是一位藏书家？陈氏学重经世致用，反对理性空谈，是开永嘉学派之先声的大学问家，传世之作为《止斋文集》，世称止斋先生。他曾在仙岩讲学，有《迁仙岩书院于屋西怀同志》诗云：“作屋皆三益，藏书可万家。”叶水心在他的墓志中也说：“拥书如城，其乐欣欣。”可见他的藏书之富。只因陈氏作为学问家的声名实在太大了，他那藏书家的名位，反被淹没无闻。

陈傅良的入室弟子宋岙人沈体仁，也是“剩著书充栋”的藏书家。他的藏书处，叫“深明阁”。叶水心曾为他的藏书楼题诗，有“沈公秘藏百余载，高阁突兀共堆积”之句。所谓“秘藏”者，即沈躬行的遗物。因沈躬行曾“游太学，时王安石废石经春秋，沈窃晦守者，自摹篆本藏之”。这么珍贵的秘籍，藏书家岂不视为至宝。“高阁突兀共堆积”，当然还有其它珍本秘籍。其藏书之富，可想而知。

许峰人曹易，也是陈傅良稍后的藏书家。他在四川当了多年“茶司”的官，别无所好，独嗜藏书。在他辞官归里的

时候，又“买蜀书数千卷归藏”。

宋代还有一座叫“邵振阁”的藏书楼，“藏书数千卷”。嘉庆《瑞安县志》以为是“邑藏书最先者”。“邵振阁”起于何时？主人是谁？均无可考。只知是个不详姓名的某“邵屿故家”，据此推知，阁址当在瑞安古县治所在地的邵屿，倘阁名“邵”字与地名有关，则“振”字也就比较好解。看来，“邵振阁”的藏书在相当长的时间，被较好地保存了下来；直到元代末年，才归季应祈所有。

宋末元初的王澄元，出身藏书世家，到他父亲手里，就已“手泽万卷”，坐拥书城的大富翁了。王澄元继承了大量藏书，自己也做学问，搞著述，他的藏书自然只增不减。

上面提到的季应祈，世居鸣珂里，隐居箕筭山，季氏藏书的精华，大部购自“邵振阁”。不幸季应祈屡遭“兵厄”（藏书家“五厄”之一），他却爱书如命，置全部家财于不顾，仅“舁书”到处走避。曾持书对他的儿子说：“吾处乱中，财物无孑遗，仅以家口免，所幸者书籍俱存……”一个“幸”字，把藏书家所特有的“内心秘密”，透露无遗。不久，“括兵（指方国珍部队）压境，应祈于坟山营大窖藏之；逻兵有椎埋（俗称盗坟）者，以为财物，发之，书遂尽毁……”做假坟藏书，用心良苦矣，而结果仍逃不脱“尽毁”的可怕厄运，难怪这位藏书家气得“几致狂”。季应祈死后，他的儿子季德基就在墓旁造了一间象征性的藏书楼——“箕筭书屋”，表示“无书而有志”，也等于给季应祈生前的藏书造个衣冠冢。这也算是瑞安藏书界的一桩逸事佳话。

元、明两代的瑞安藏书家，略知梗概的有三家：“万轴

“牙签云气湿”的“陶峰书屋”林学正，“牙签万轴邨侯书”的菜根道人倪寅，以及“连屋图书雄百雉”的李树声。上引诗句容有夸浮之处，就打它一个大折扣吧，这些人的藏书依然不在少数，也够得上藏书家的称号了。

到了清代，瑞安的藏书家辈出，其藏书规模及使用价值，较之前辈均有过而无不及。

方成珪，“生平博极群书，尤精校仇之学。”他的藏书楼命名“宝砚斋”，座落古县城杨衙街。方氏长期在宁波当教官，“官奉所入，悉以购书，储藏数万卷，丹黄殆遍”（孙诒让）。这些书籍，又大部经过方氏亲笔校点批注，尤为可贵。

“珠树楼”，在老县城的午堤街，是项几山的藏书楼。他的兄长项雁湖，在草堂巷也有一座命名“水仙亭”的藏书楼。项氏的上代是瑞安有数的富户，而世代都爱好藏书。几山兄弟俩是道地读书人，且家中富有，藏书当然又大量增加，合起来竟有数万卷之多。雁湖先卒，几山曾把所购的书全部陈列在雁湖的灵前，嘶声哭痛了好几天，兄弟俩爱书之情，生死不渝。后人称项氏“水仙亭”、黄氏“参绶阁”和孙氏“玉海楼”为瑞安藏书三大家，盖非言之无据。

张懋中的“爱山楼”，是与“水仙亭”同时兴起的藏书楼。张氏世居汀田里，“爱山楼”大概也在那个地方。“爱山楼”用江淮、河汉、波涛、汹涌、汪洋、浩瀚等十二个字作为插架编号，别具一格。孙锵鸣在张茂中墓表中，有“百城坐拥，有小万卷之名”等语。当后人给张氏的藏书编目时，所剩的也只有三百四十多部。

黄绍箕是晚清著名学问家，也是著名藏书家。黄氏的藏

书座落东小街，命名“参绶阁”，系“取扬子方言，瓠越之间讲高远曰“参绶”，固以名阁。黄氏“储蓄旧槧，视若性命，宦辙所经，辄以搜罗古金石为事，颇得秘本，会稽何竟山所藏，大半归其所有。”杨嘉撰《参绶阁旧本目录》，仅录其藏书一百多种，都是宋、元、明槧及日本刊本，计宋刊八种，元刊十一种，明刊八十多种、日本刊八种，共计三千八百多卷。据张宋庠讲，这个书目，“乃其散亡之余，盖善本中仅得十之一二耳”。据此推断，“参绶阁”善本藏书，当在二、三万卷之间，可谓富矣！有人说，“参绶阁”善本度藏，未必逊于“玉海楼”，也许不是无稽之谈。

此外，后河街洪守一的“万卷图书空堆案”的“棣花书屋”，五显殿街孙锵鸣的以宋刻麻沙本《名臣言行录》压卷的“海日楼”，会文里陈黻宸的“饮水斋”，水心殿街林公铎的“叔苴阁”，第一巷李雁晴的“横皮室”，汇头街张宋庠的“籀经楼”，大街董朴垞的“传经楼”以及杨绍廉的“宗许楼”等。虽说都已人亡书散楼毁，但作为一代藏书家的事迹，应永远留在后人的记忆中。

清代同治年间，瑞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集体藏书家——“心兰书社”。参加这个集体有许拙学、陈仲舫、陈虬、池广文、林香史、周筐衫、林菊君等二十人。陈虬的《心兰书社藏书引》有云：“士皆苦无书读……一瓠之艰，与荆州等。盖得书之艰，古今有同慨也。”为了同行都有书可读，他们便相约“合资聚书”，“互相切磋”。经过二十一年的惨淡经营，做到了“寻常文史，略可足用”。说来“寻常”，实不“寻常”。因我国是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即寻常文史，亦浩如烟海，既已“略可足用”，则藏书之富，已非

同一般。书社还有一个特点，他们购藏书籍，完全为了实用，从来不计版本，所以收藏也比较容易。后来，书社同仁的心怀更加宏大，竟把藏书“公之闾邑”，面向全县读书人，遂开瑞安公共图书馆的先声。“心兰书社”原址矮凳桥，现虽已改观，而心兰巷的巷名尚存，颇有纪念意义。

胡道静在《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序》中说：“藏书家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癖好，以博藏群书，护持保存为自己的责任，而且总希望一己的收藏，世世代代保存下去。虽然这个美好的愿望，万分之九九九九不能完满实现……”瑞安的藏书家何尝不如此呢？“人亡书散”，几乎是每个藏书家所能预见而又无可逃避的厄运，这当然是身后之事了。事实上即在藏书家的有生之日，倘遭兵、水、火等灾，生平的心血结晶，也会毁于一旦。试想，季应祈总算够机灵的了，筑假坟藏书，原以为万无一失，而结果还不“尽毁”？“玉海楼”虽然安然无恙，而它的八九万卷藏书，也已星散殆尽。尽管如此，历代藏书家还是前扑后继，代有传人，他们那种“接力赛跑”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同是藏书家，也非清一色。有些藏书家，同时又是著述家。“玉海楼”后人孙延钊说：“著述家之藏书，非徒以得签锦轴为玩观者也。”这就有异于“为藏书而藏书”的专家。对他们来说，得签锦轴固足玩观，得好书也要喜不自胜，但他们的最终目标还在于著述。瑞安的多数藏书家，都属于此一类型。如陈傅良、方成珪、孙衣言、孙诒让、黄绍箕、陈黻宸、林公铎等，无不“读书破万卷”，“著作称等身”的著述家。孙诒让则登峰造极，著述三十余种，世称“朴学大师”。如果太史公没有机会读到浩如烟海的“内府秘籍”，

未必写得出不朽的巨著《史记》。同理，如果孙诒让没有“玉海楼”的私家八、九万卷藏书，象《周礼正义》、《墨子闲诂》以及《契文举例》等学术巨作能否产生，就很难说了。例如，《墨子闲诂》中仅《备高临》第五十三的一个小章节中，参考书目就多达数十种，包括经、史、子、集及笔记、野史、杂说等。（据说有个叫阿明的帮手，孙诒让把第二天要查考的书，开了书单，让阿明找出来备用。“玉海”书藏数万卷，且别说孙诒让学问的渊博，就是阿明这个差使，也如“大海捞针”，谈何容易。假使阿明活到今天，他一定是个精通古籍管理的专家，了不起的目录学家。）在特定意义上说，要不是大藏书家，也就成不了大著述家。现代有了公共图书馆，现存的私家藏书楼如“天一阁”，也早已“化私为公”，这就另当别论了。马克思就是借助于国立大图书馆的书藏，苦心钻研，写出了《资本论》及其它著作。

但是，各人的想法，未必尽同。也有人认为：“藏书家固然功不可没，有时他也过大于功。理由是：正因为藏书家的集中收藏，才招致集中被毁的危险。冤哉枉也！藏书家的初衷和他们的苦心孤诣，岂是“集中被毁”吗？天灾人祸，又岂是藏书家所能逆料和抗拒？人亡书散，也无非转归别一藏书家或读书人所有，书还是在的嘛，有的书则捐献归公。集我国历史文献之大成的《四库全书》，要不是全国藏书家的“奉献”，那些珍本、善本和孤本又打哪里来？所谓“水流千山归大海”，那源流，也只能是私家的藏书。就说现在，全国各公立大、小图书馆的古籍部，事实上也是私家藏书的汇集之所。瑞安“玉海楼”的几乎全部藏书，现在就分散庋藏于北京、杭州和温州图书馆；“参绶阁”的万册藏书，现

在也归温州图书馆珍藏，成为大众的精神财富。藏书家又何罪之有？

历代藏书家已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则藏书家的历史地位，应予肯定，藏书家的精神，应予宣扬。这本是文化史家的事，这里只不过提个建议。

本文参考资料：①嘉庆及民国《瑞安县志》，②孙延钊《温州藏书家考》

仙岩梅雨潭联语

黄 体 芳

仰看九天落珠玉
坐闻万谷酣笙钟

佚 名

飞瀑半空晴亦雨
梅潭终古夏如秋

赵钧与《过来语》简介

周梦江

赵钧，瑞安市莘塍区下金（现名上金）村人。生于清乾隆五十一年（1788年），卒于同治五年（1866年）。二十一岁考中生员，一生都在县内地主富人家坐馆，足迹未出温州一步。他的著作有：《过来语》、《颐志篇》、《定斋杂草》、《定斋吟草》、《谈后录》。等。

瑞安素有“东南小邹鲁”之称，大家所熟悉的学者文人较多，然很少有人知道赵钧。因此距他死后只有一百年光景，他的著作已散失殆尽，仅存《过来语》二十册和《谈后录》一册，但亦经鼠咬虫蛀，字迹脱落，难能辨认。据说《过来语》原有七十多册，今天的二十册实际只有十八册，约三十万字。其中第十八册已失佚，第二十册为《安居日记》，是这残存的十几册中个人生活情况的汇录。

赵钧自称“《过来语》一书，虽是小著作，实非虚靡岁月”。所谓“小著作”，是他的谦虚，实际并非如此。“实非虚靡岁月”，倒是老实话，本书是重要的乡邦文献，是一部丰富的宝贵的近代史书。因为他的一生虽然平淡无奇，而他所处的社会却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生出灿烂多姿的历史事件。他身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目击耳

闻近代史上的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革命两大事件。他是一位关心时事的爱国儒生，在教课之余，喜欢采访新闻、逸事，而且有闻必录，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这样，日积月累，便使《过来语》成为一部日记体的史书。

1962年，笔者向市图书馆借到《过来语》手稿，每晚后摘录一些，经过一年时间，辑出八万多字，发表于《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四期。

《过来语》的内容，主要有：

甲、有关鸦片战争的记载

鸦片战争是我国第一次受到资本主义强国的侵略，也是我国从独立自主的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开始，对我国影响至关巨大。1841年10月的浙江定海战役，是这场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次战役。我国阵亡三位总兵，英人亦伤亡惨重。因温州距离宁波很近，特别是郑国鸿是处州镇（今丽水地区）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又曾任瑞安副将，他们的部下有温州和丽水、青田人，这给赵钧提供了当时的具体的真实情况。他记述定海陷落情况说：“逆夷自（阴历八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叠次攻打定海新筑土城，俱未得手，且被定海镇葛（云飞）击毁火轮舡一只。逆夷于十四日由陆路晓峰岭□□（两字脱落，疑为“而下”），经寿春镇王（锡朋）带领兵士奋勇拒敌，相持四日，杀逆无算。至十七日，该逆仍更番递进，寿春兵所余无几，王镇军伤重殉节，晓峰岭为该逆所夺，由岭转攻竹山门，处州镇郑（国鸿）阵亡，葛镇军……亦先后殉节”。

关于这次战役经过，我国解放前后出版的各种中国近代史书，都没有专门叙述，原因是资料不足。197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丛书》的《鸦片战争》，亦只引用英国侵略

者的资料，而缺乏国人自己的记载，本书刚好填补这一空白，其史料价值与意义是巨大的。

至于书中记述当时在宁波主持防务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自杀殉节，和赞美林则徐，斥骂卖国大臣穆彰阿、琦善、伊里布，“若要平英夷，须斩穆、琦、伊”等事。各书虽有记载，但身处穷乡僻壤之赵钧亦有所闻，可见当时我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情况。

乙、鸦片战争前后的温州景象经过鸦片战争，我国割地赔款，毒品大量输入，国家社会元气大伤，阅读书中所记战前战后的温州景象，使人感受十分强烈。书中记载清道光七年（1827年）情况：“闰五月，龙舟甚多，兼之邑有彩舡，游人更盛。初四日，余与诸门人泛舟至拱瑞山看竞渡，士女四集，几至舟不能行，水面风来，香粉之气居多”。又记道光十八年（1838年）：“正月望日，出户玩月……遥闻东北方赛神，金鼓声，花爆声，闹热异常，太平景象，于斯见之”。

鸦片战争后，毒品大量输入，造成祸害。“闻英吉利夷商贩卖鸦片，嘉庆末道光初，一年进口不及千箱。庚子内犯（按即鸦片战争）后，每年进口过二万箱，……（道光二十九年即1849年）三月二日记”。“近年花会、鸦片二者盛行，人家不肖子弟，因此破家丧身者，无地无之，（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八日记”。温州这时捐税奇重，灾荒频仍，米价飞涨，人民挣扎于死亡线上。”赵令景铭，无政不酷。……冬十一月下乡亲征，粮价（按指田粮银征收价），新银价一两二千八百（文），新米一石价六千（文）。郁翁言，三十年前，……银价一两，千五百；米价，一石二千外。（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十二月廿一日记”。这里的“新米

一石价六千”，是指缴纳田赋每石米折价六千文，不是实际的米价。而从书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米价，一石米已由一千多文涨至四千多文。由于米价上涨，田赋银米价也随之升高。这时温州灾荒接连发生，瘟疫随之流行。“温郡自旧秋水灾后，瘟疫流行”。“（瑞安）场桥、梅头二村，各失丁二千；上戴一村百七十丁，失去一百；鲍田、海安皆失不少。（咸丰四年）七月十一日记”。“水灾后，阖郡告饥，或拾鳧茆，芦菔，或采山野各草，凡可充饥者，搜取殆尽。（咸丰三年）七月三日记”。

荒年人民固然饿死，而丰收时人民仍难生活。他记述：“（咸丰四年）十月初，好焦谷只合七百五十文百斤，（按从谷价折作米价，一石计一千五百文），谷价如此骤减，宜贫民易以谋生，而典当既尽，借贷无门，仍有衣不蔽体枵腹坐饿者，十室九空，于今为极。早季后，仍有吃糠，吃番薯叶者”。素称鱼米之乡的温州情况尚且如此，全中国的情况可想而知。所以他惊呼：“近年四川啮匪，河南捻匪，湖南斋匪，湖北痞匪，广东艇匪，皆为民害。（咸丰三年）正月记”。全国各地人民在本国封建势力和外来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剥削下，纷纷起而反抗了。

丙、太平天国期间温州人民的反抗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后，在太平军进入浙江的影响下，温州人民亦不断的起来斗争。本书记载了从咸丰三年至八年（1853——1858年）的短短五年内，温州各县就发生过十多次起义。单单永嘉瑞安交界的大罗山就有三次起义。“大罗山地界永、瑞，邃远深广，又多岩洞，素为贼藪。近年因粤‘匪’作乱，奸徒乘变生心，招引党类，肆

行劫掠，加之风水为灾（按：指咸丰三年温州水灾），游手饥民，不呼而至。旧冬十一月间，聚集几二百人。……（咸丰四年二月初四日仙岩周生毓芹说。”这些小火星不久汇成较大的火炬。“（咸丰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乐清监生瞿振焕（按即瞿振汉，因焕、汉方言同音，故作者误记）反，杀死县丞，乐清协。‘贼’伙各以红布一方为号，焚劫仓库，郡城告警。乙卯（咸丰五年）正月，‘贼’渠正法，旋平”。（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九日，孙侍读蕙田泉（按：指孙锵鸣的潘岱老家），被平阳金钱会‘匪’焚劫一空。次日，平阳城外亦有焚劫。闻雷渎地方，一村俱归孙氏忠义团，八月前与钱匪战，被杀四五百人”。“八月二十八日辰时，钱‘匪’蹈郡城”，旋即退出。“（九月）初三日夜，钱‘匪’经过永邑之娄桥村，……辰刻，又图攻郡城，为知县高公督兵击退”。这里所谓金钱会“焚劫”，是作者误记道路传闻之言，作者自己在书中记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看来焚掠之惨，官兵甚于叛贼，乡勇又甚于官兵”。“十一月初二日午后，‘贼’（按对金钱会起义群的诬称）由上韩经过，妇竖不惊，安堵如故。……十一月初三日午膳后记”。

在太平天国革命期间，不仅广大农民和清政府矛盾严重，就是地主阶级内部，中小地主对清政府和官僚地主亦是非常不满。因为这时军费支出骤增，平时正常捐税收入远远不敷所出，于是清政府就在自己统治区内劝捐军需。赵钧在咸丰四年二月十三日记：“现在十室九空，朝廷又下捐输诏，……时谓之勒捐。黄抚军宗汉严札州县，着依限照数令各殷户赶紧捐纳，否则动用大签，拘提如重犯。”他详细记述了瑞安捐局的弊端：“瑞邑主其事者为孙编修锵鸣，领局者

为沈教谕丹书，分任劝捐局绅为胡棣甫、许岳甫，……局中人各自庇其亲戚知好，……瘠人自肥，互相倾轧”。他的东家陈某是个无背景、无权势的地主，已捐纳大部款项，因言辞偶而触犯孙锵鸣，竟被扣押，又花了大笔钱才得保释。他为之愤愤不平。太平天国革命期间有不少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其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乐清红布会首领瞿振汉是监生，金钱会领袖之一的蔡华是贡生，其弟蔡岑是廪生，他们家中都颇有田产，蔡华是瑞安屿头人，他参加金钱会的原因之一，就是与同村曾任湖北粮储道的林培厚家结怨而成的。”（蔡华）三年前与林氏构讼后，怨结不解，……故林氏之受害独深。”指林家遭到金钱会的破坏。

此外，瑞安发生举人蔡庆恒（小琴）率领士绅抗拒田赋加价征收，演出一场痛哭明伦堂毁坏圣牌的闹剧。县令傅斯恻利用山东军犯殴打蔡小琴后，畏罪自杀，教谕沈丹书被撤职。温州知府特地派员来瑞安安民。

书中还记述了太平军于同治元年（1862年）分两路攻入温州事，一路由丽水、青田到永嘉、瑞安；一路由台州至乐清，再至永嘉。金钱会众又再度起义。“旧腊，长毛贼入境后，会匪死灰复燃，相倚为助。”

丁、其他种种

除上述有关地方史外，本书还具体记述温州地方沿革，温州、瑞安府县官姓名，人情风物等等。对今日撰写市志、县志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下面简单举例说明：

（一）地方的沿革

书中记述瑞安肇平垵建村的由来，“塘下对岸田，旧名潮平垵，饶地也。自为平阳人寄种其地，三四十年便成村落。

丁、财、秀三者俱全。”

(二)关于清代的瑞安县令，我曾翻阅过民国《瑞安县志稿》。其中所记历任县令，大多没有姓名。而本书从道光六年至同治四年的历任县官姓氏、籍贯等等，都有一些记载，因为他虽是塾师，毕竟是个生员；儿子赵醇是廪生，且因镇压金钱会，防守太平军有军功以训导选用，对官场比较熟悉。

(三)在物产方面，书中颇多记载。如番薯，它是明代由南洋传入我国福建的，何时传到温州？情况不详。据他在道光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记：“据江村老人说，温郡所种番薯，五十年前尚鲜见者，亦不谙晒干之法。今则荡地种者，连阡累陌，驯至深山海岛，亦无剩土矣。”

“本春一都地方，有一种麦名红麦，正月间便黄熟可食。”

(四)关于教育，科举情况，他也记了不少。书中有“（道光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莘塍聚星书院首事请邑尊刘心斋礼璋开课，城乡士子并集，气象极盛。课题：‘日知其所亡’二句”

(五)关于天文星象的记载很多。如“（道光二十六年）元月初二日，正午，天上有赤团如毬，斗许大，自南飞向北。”据前几年的《温州日报》一篇文章说，有人以此作为“飞碟”，著文刊于香港某报。

综上所述，赵钧《过来语》一书，对我国近代史，特别是对温州瑞安史事，确有很大贡献，同时，他以一介穷儒，以古稀之年力著此作，其精神殊属可嘉，故为介绍，以求见重于市县志。

1988年12月12日写于温师院宿舍

孙诒让论教育

史拾遗

晚清朴学大师孙诒让的晚年，即1895年至1908年，在短短的十二、三年间，他在温州和处州（今丽水）两地，创办和筹划的各类学校，不下三百所。他创办的第一所学校（瑞安学计馆）的时间，比清廷“废科举，兴学校”，整整早了十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孙诒让是我国现代教育的先驱者，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因此，孙诒让关于教育的言论及实践，理应载入史册，成为我们受用无穷的精神财富。

忧国忧民 决心兴学

窃谓今日事势之危，世变之酷，为数千年所未有。中国神明之胄，几不得齿于人类。……睹此危局，靦然人，不愿坐视夷灭。

——《兴儒会略例》

近者五洲竞争方烈，救焚拯溺，贵于开悟国民，讲习科学，不佞曩者所业，固愧为狗已冻，屠龙无用……殊不欲他人之效我也

——复日本者学馆森鸿

储才兴学，以待国家之用。……则凡践土食毛者，皆与有责焉。

——《经微室遗文》

国将兴必尊师重教，……国将衰必贱师轻教。

——孙诒让引《荀子·大略》语

孙诒让生于鸦片战争之后，辛亥革命之前。这个时期，满清王朝腐败无能，外国侵略势力步步进逼，五千年文明古国，已处于被列强瓜分，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孙诒让“睹此危局”，岂能“坐视夷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孙诒让便不断地探索着救国拯世之道。到了他的晚年，他已醒悟到，过去埋头做学问，专治朴学，“为狗已陈，屠龙无用”，实际上救不了自己的国家。而一时风行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都相继短命而终；以反清排满，建立共和国的旧民主革命，能否成功，一时还无法预料。且孙诒让毕竟不是革命家，又不是军事家，只是一位满腹诗书的大学问家，因此，他就以“储才兴学”为已任，决心把教育事业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孙诒让看来，“开悟国民，讲习科学”，简直象大火大水中救人一样的“十万火

急”，刻不容缓。

显然，孙诒让办教育的动机和目的，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孙诒让教育思想中最可贵，最令人敬仰的地方，就在这里。

凡百新政 教育为本

盖凡百新政，无不以此（教育）为根本，又非徒学务而已。

世界日进于文明，觐国者必以教育之能否普及，为强弱之符验。

盖优胜劣败之通理既明，感国弱种之危机又迫，所持以斡旋时局，维系人心者，仅此教育一线……

——《学务本议》

当时的新政，就是要改革封建王朝老一套的统治办法，包括“废科举、兴学校”。孙诒让把普及教育提到战略性的高度上去，作为推行新政的根本方针和任务。也是“斡旋时局，维系人心”的唯一的纽带。而当时的当权者，几乎没有一个人能有如此高度的认识。孙诒让列举当时的腐败情况后指出：“欲使教育普及，已二十年不能充其望。若欲通国四万万人无不受教育，以与列强驰骤于环球，其亦俟河之清矣！”

为什么把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到这个地步呢？在孙诒让看来，只有全国人民的文化修养和科学知识达到一定的水

平，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以与列强驰骤于环球”。这个观点，不仅在过去，就是在今天，也是非常先进，非同凡响。

据统计，我国现有文盲半文盲的数字，竟达2.29亿（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查报告），多么惊人！因此，我们今天的口号，依然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学以致用 以应时需

学无新旧，惟其致用。

——《学务本议》

专课算学，以应时需，然特致用之一端耳。

——《学计馆学规》

孙诒让做学问，历来都是继承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原则。应用到教育事业上来，也必然贯彻这个原则。学来的东西，必须有用，还必须适应时代的需要。这就跟科举时代把读书当作进衙门、当老爷的敲门砖，完全不一样。

孙诒让办的第一所学校，就出人意料。这所学校根本不读四书五经，专学算学，叫做“学计馆”。为什么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专学算学，以为致用之本。”又说：“造乎其微，则步天、测地、剖器、治兵，厥用无穷……西人之所挟其长以雄视五洲者，盖不外乎是。”

现在几乎人人都明白，一切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离开了数学这门基础知识，就等于一句空话。而一百来年前的孙诒让，已如此重视算学，他的远见卓识，实在惊人！也只

有培养大批的数学人才，科学才能发达，国家才能富强。

“五四”运动要向西方请来的一位“赛先生”，也就是科学的别称嘛。可惜到今天，我们自己的“赛先生”还不够争气，无法“与列强驰骤于环球”，岂不愧对先哲！

正如孙诒让讲的，算学只不过教育事业“致用之一端”，并非全面。所以孙诒让也办了其它类型的学校。为培养植桑养蚕的“蚕学馆”，培养化工人才的“化工学堂”，培养师资的“温州师范学校”，以及普通中、小学校。他的办学原则也始终只有一个，即：启民智，育人才；学以致用，以应时需。这个原则，到今天也没有过时。

全民教育 面向社会

夫中国自秦以来，无国民之教育。其号为文明者，大抵为士人。求其不为利禄而为之者，殆十不得五。

普及教育，兼重女子。……我国女子无学，教育之不能普及，亦其一端。

……补习学校，宜别设旁听生名额，俾校外家塾学生，亦准报名，随时来校听课，以为入学之预备。

——《学务枝议》

专制独裁，愚民政策，这是孙诒让深恶痛绝的东西。那些受教育的“士人”，多半是些追逐个人利禄之徒，对国

家并没有好处，反而有害。真正救国的力量，在于广大民众之中。而民众因处于统治者长期的愚民政策下，没有知识，不能觉醒。因此，孙诒让就特别强调教育普及的重要性，要把教育普及到民众中去，把社会当做大课堂，并付诸行动。

封建伦理，“女子无才便是德”。孙诒让偏偏办起了女子学校，家塾学童读的四书五经，让他们先到学校当旁听生，然后吸引他们入学，接受新知识。这且不说，特别惊人的措施是，孙诒让竟把历来禁止平民入内的明伦堂的大门打开了，举行公开的演说会。不管你是做工种田的，经商当兵的，只要愿意，都可以前来听讲；演说的内容也十分多样，有的讲中外历史和时事，有的讲科学知识和地方新闻，甚至还议论当地官府的是非。演说会每月两次，整整办了三年，每次听讲的人都有好几百，把偌大的明伦堂塞得满满的。谁说民众不要知识？愚民政策罪大恶极！为民众着想，孙诒让还提倡汉字简化，方便民众识字。

那个时候，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新闻报纸也很少，民众也不识字，看不懂。象演说会，就是当时最“适应时需用以致用”的一种好办法了。

普及教育，当然不限于校内，而要把课堂摆到社会上去。目的仍然是改进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以致国家于富强。要不然，正如孙诒让所感叹的中华民族，“几不齿于人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担心和议论的“球籍”问题。先辈曾经警惕的事情，我们难道还能无动于衷？

内行领导 专家治校

欲求全国无不受教育之士民，必先求无不受教育之官吏。

其视学校也如缀旒，其嫉学校如蛇螫者，挟其虚怯胶固之见，而昧变通久大之图，卒以蒙世大垢，则不通教育故也。……至于杂流竞进，或者不解文义……而望其精究学务，固知其万无可冀矣。

——《学务本议》

西国教员多为师范出身，故胸有成竹。

——《籀廌遗文：与刘次饶书》

孙诒让在这里强调了两个很重要的原则：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专门的学科，办教育的人必先受教育。因当时的许多学官，他们要末把教育看作“缀旒”一样的装饰品，要末害怕教育事业有如“蛇螫”，甚至连“不解文义”的家伙都钻进来滥竽充数。孙诒让对这种现象的批评是极其尖锐的，但当时的事实正是如此。孙诒让以西方为例，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张，说：“治学务者，又必择专门大教育家领其事。”这也是现代所谓的“内行领导”。因此，孙诒让对当时的大教育家蔡元培，是十分佩服的。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典型地表明了孙诒让坚持原则的严正态度。当时浙江省的学官满人宝棻，正是孙诒让所说的“不通教育”的官僚。孙诒让当时在

主持温州学务，便经常和宝棻发生冲突，使宝棻怀恨于心。恰好乐清发生了鼓吹革命的“新山歌案”，当事人陈梦熊是女子学堂堂长，也是革命党人。孙诒让挺身而出，为陈申辩。宝棻便借机报复，栽孙诒让一个“包庇逆党”的罪名，一箭双雕。孙诒让毫不畏惧，针锋相对，还暗中拥送陈梦熊脱险，东渡日本。

学计馆，是孙诒让创办的第一所学校。他便请了数学家林调梅当总教习（馆长），实行专家治校。孙诒让也非常重视师资问题。瑞安普通学堂缺少合格的理化教师，他就选派了两名得意门生，前往日本留学，专修理化，学成后回校教习理化。还高薪礼聘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来当英文教师；连体育教师也多方物色，最后才通过在湖北当官的黄绍箕，聘来了一位专门人才。“名师出高徒”，普通人都懂得的道理，孙诒让自然照此办理，身体力行。后来孙诒让创办了一所正规的温州师范学校，他的用意也就要培养合格的师资。

内行领导，专家治校，再加上合格的师资，这就是孙诒让办学的设计蓝图。

千方百计 集资办学

欧美各国学校，国家咸有巨款补助，以日本三岛之褊窘，政府所支学费，年亦虑数千万。吾国版图宏廓，民智蔽翳，若非筹大宗正项，以预为维持，窃恐强迫教育，万无可措乎。夫教育之道，本为国民开其智识，

则其经费，宜通国士民各有负担之责。

迩来各省办理学务，类皆困于经济之窘绌，教科不能完全，教员不能精聘，好学之士，不能饗其所望，遂相率褰裳远引，求学外国。……何如自筹巨款，以广兴完备之学校，俾远游求学之士，接踵来归……

——《学务本议》

使孙诒让伤透脑筋的还有一个教育经费问题。清廷已腐败透顶，你讲外国的经验如何重视教育，给多少智力投资，等于对聋子论道，当时兴办的地方教育，要官府出钱，也象割它的肉一般。孙诒让先后创办和筹划的三百多所学校，真不知化了多少血，惹了多少烦恼。

学计馆的开办费，就全靠民间劝募来的，连孙诒让自掏腰包二百圆，也只凑了一千五百零六圆。所以连讲堂的课桌椅，都要“借用文场士子就试所用长板凳桌”来穷对付的。真是“箝终蓝缕”，艰苦之至！再说温州师范学校，因规模较大，光校舍建筑费就得二万三千圆，那时孙诒让已有病在身，走路也不灵便了。而他依然千方百计，苦口婆心，终于向富商那里劝募了二万八千圆。偌大的温州府，是不是拨“巨款资助”呢？不。据说仅仅给二千圆，还是卖了孙诒让的大面子。试想，孙诒让要不是出于对教育事业的极端忠诚，何必如此呕心沥血，死而后已！令人遗憾的是：当温师校舍落成，学校开学后不过一个月，创办人孙诒让便与世长辞了。

今天，智力投资，办学经费，不是也是个难题吗？孙诒

让能用民间集资的办法，办起了三百多所学校；他那种艰苦卓绝的办学精神，对我们后辈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和继承的地方。

至于派遣留学生，孙诒让的见解，对今天的一发不可收拾的“留学热”，可能也是一服对症的“镇静剂”。

孙诒让离我们而去已经八十周年了。当我们重温《学务本议》等教育论著，无不被他的无比炽烈的爱国热忱，高瞻远瞩的教育方略，以及艰苦卓绝的办学实践所深深感动。而当我们联系今天的教育现状，目睹“流生”、“流师”现象的日益泛滥、“读书无用论”的兴风作浪，又不禁令人忧心如焚，愧对先哲。目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虽已定为国策，但扭转已成的教育大危局，仍有待于最高当局的痛下决心以及全国全民的共识和努力。大诗人杜甫诗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尽蔽天下寒士俱欢颜。”我来套用一下，改做“安得学府千万间，尽蔽天下师生俱欢颜。”就让我们把这个理想变成现实吧，以告慰先哲的在天之灵！

1988年10月5日

·人物小志·

王超六

达官名宦与经学大师

张之洞与孙诒让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廌，浙江瑞安人。一居北，一居南；一为清季名宦，一为清季大儒，颇无相似处。但两人相识，且情谊深厚。张于清同治六年（1867）充浙江乡试副考官。孙于是年考取举人。孙称张为“南皮举主”。张视孙为得意门生之一。孙诒让与同邑黄绍箕（字仲弢）友善，学术与政治相近，时人称为“二仲先生”。黄为张之万的女婿，即是张之洞的侄婿。孙通过黄的关系，与张更加接近。

科名仕途上，孙诒让为晚清经学大师，精校勘、训诂、文字之学，对科举取士的八股文章是不内行的，他能考取举人，还是得到副考官张之洞的赏识及正考官太和张沅卿与巡抚马新贻的垂青，破格录取的。此后，孙八次赴礼部考试，均未被录取。从此不复赴京师。光绪诏开经济特科，第一次，经湖南巡抚陈宝箴、江苏学政瞿鸿禛的推荐，孙不去。第二次，经张之洞的推荐，孙又不去。光绪三十年

(1904)，张之洞任湖广总督，设存古学堂，电聘孙为总教习。略谓：“鄙人因世衰道微，正学将晦。特于鄂省，奏设存古学堂。足下经术淹贯，著作满家，实为当代通儒之冠。窃欲奉聘来鄂，为此堂总教习，以惠士林。此为存绝学维世教起见，务希鉴允。详情另由黄仲弢学使函达，先祈示覆。”孙接电后，踌躇徘徊。香师之命，情词恳切，不得不去。但为了自己的志向，实际上不想去。于是，他一方面复电张之洞敷衍；另函黄仲弢婉陈，荐贤介绍，以求脱身之计。他覆张电，略谓“存古总教，本非衰庸所敢任，重承师命，敬当礼遵。驻鄂一节，恐不自由。”他致黄仲弢的手扎，略谓：“奉诵来书，并有南皮师来电，师意甚坚，度非口舌所能争。而轻率遵命，又非鄙意所愿，似不如辞之。实则年来意兴阑珊，凡百灰心，亦必不任鞭策。或以尊意另荐宋芸子任此，似胜鄙人万倍。又江苏知县林颐山，为黄元同高第，亦可备选，请酌之。”孙诒让在科名仕途上是坎坷的。一介书生，白首举人。而张之洞则以“文儒致清要。”同治进士，累官湖广，两江总督，军机大臣，飞黄腾达，仕宦显贵。卒赠太保，谥文襄。

政治上，张之洞善观风色。维新运动时，先支持。迨“政变作，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清史稿、张传），八国联军时，进行东南互保。和议成，两宫回銮。论功，加太子少保。光绪暨慈禧太后相继逝世，醇亲王戴洋监国摄政。之洞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而孙诒让虽是一介书生，白首举人，具有热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见义勇为。凡有营救爱国志士的行动，都向张之洞乞援，或通过黄绍箕转陈。戊戌政变，孙闻谭嗣同、刘光弟、林旭、杨深秀等系

狱，即驰书鄂督张之洞，责以大义，请迅设法营救，以伸士气。而张不能行，徒对扼腕而已。革命党人徐锡麟在安庆枪杀皖抚恩铭，事态牵连绍兴大通学堂，省派第一标兵到大通学堂，逮捕堂长秋瑾等人。浙抚张曾敫是张之洞之侄。孙诒让闻讯，立即电鄂，力请张之洞密示其侄曾敫设法营救。张有难色。孙仍电，有“越事仍希主持，感切”之语。秋瑾终为绍兴知府贵福所杀害。

乐清发生新山歌案，牵连孙诒让。孙任温处学务处总理以来，与本省及本郡守旧派官吏多有抵触。浙省巡抚张曾敫与孙有世谊。凡遇事向省抚直接陈明，批准后交省学务处备案。省布政使兼省学务处总办宝棻大为不满，对温处学务处故意刁难。于是阴嗾温州知府锡纶，永嘉知县丁维晋，乐清知县何士循等守旧派官吏，出面与温处学务处挑衅。适乐清陈耐辛（一名乃新、名梦熊，系虹桥女学堂堂长）唱新山歌鼓吹革命。乐清知县何士循上报，以温处学务处引用党人。孙诒让闻讯，飞牍为之申辩。复驰书省抚张曾敫，请予从宽处理。而宝棻等正欲借题发挥，陷害温处学务处，力请张抚澈查严究。张抚派委员沈维城来瓯查办。沈至，孙力为耐辛解释。沈复至乐清实地调查，则知所告聚众演说，并无其事。即新山歌书亦未能证实为耐辛所为。稟复浙抚。张抚主办坐诬。宝棻大不谓然。复请派员复查。张抚恐事累己，密电求救于其叔之洞。诒让亦电黄绍箕，请予援手。时张之洞适内召入军机处，即将宝棻调移山西布政使。同时张抚调锡纶为金华府知府，丁维晋为长兴县知县，何士循为桐庐县知县。宝棻既离浙，锡纶等又离温，此案不复重翻。

孙诒让对张之洞，尝有不满之辞。光绪壬寅，致书永嘉

张筱孟（志瑛），有云：“广雅师负中外之望。戊戌、己亥两次改政，师委蛇其间，无所建白。不佞深不谓然，不免腹诽。”

事业上，张之洞居官施政，与孙诒让居乡办地方事业，有不约而同，不期而合处；或为之支持呼应，孙且身体而力行之。《清史稿》张传：“大冶产铁，江西萍乡产煤。之洞乃奏开炼铁厂。……修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为最大。……其尤要者，则设学堂，停科举，奖游学，皆次第行焉。”孙诒让于光绪十四年（1888）看到薛福成上奏，言铁路有百利而无一害。随作书后语云：“兴办铁路，开发大陆交通，增进国家文明，最为当今重大而切要之新政。开矿山、采煤铁、冶金铸铜诸新政，皆与铁路密切相关。”他主张兴办铁路，但反对借外债办杭甬铁路，参加组织浙江保路拒款会，向各界招募筑路股款。孙早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赴鄂，谒张之洞时，力言筑路，为救国急务，香师极表赞同。而以廷议未合，未能开办。师意欲先开矿聚铁，俟规模略备，再行请旨举办。孙诒让以周礼尹人，专掌冶矿，为古今矿政之权舆。他查有永嘉孙坑产铝矿，组织富强矿务公司。转请矿务大臣盛宣怀派员来温勘察。矿务署派英籍工程师，由翻译王省三同来。查系铝矿内含银质千分之一、二，估计产量不多。又以交通不便而辍。

张提倡“国语”即官话。1903年，他奉旨，同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订《学务纲要》，史称“癸卯学制”。该纲要第二十四条规定：“各学堂皆学官音。”并指出“各国语言，全国皆归一致，是由于“从小学教学拼音始，就注意训练，统一全国语音。而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

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因此必须拟以官话统一天下之语言。”孙诒让于1904年，以本乡土音特殊，为官署人员或外地来宾相见时，往往言语难通，不便于接谈。发起举办普通话讲习班，且自任教导。

张之洞于1891年，在武昌创办了一所专门算学学堂。孙诒让于1886年，在瑞安创办学计馆。学计馆的概况，已被编入《中国近代教育史大事记》。“学计馆”三个字的匾额，是张之洞书写的。学计馆逐步发展为瑞安中学堂，是瑞安中学的前身。这个匾额尚保存在瑞安中学。

学术上，孙诒让著《周礼正义》八十六卷，其自序说：“草创于同治之季年，始为长编数十巨册，缀集未竟，而举主南皮张尚书议集刊国朝经疏，来征此书，乃隐抚颺理写成一帙以就正。光绪十六年（1890）二月，携书赴鄂，就正于之洞。返沪时，致书同邑周伯龙说：“到鄂谒见香师，深荷优睐。之洞在《劝学篇》（经学通大义）说：“……群经以国朝经师之说为主。……仪礼，止读胡培翬《仪礼正义》，周礼止读孙诒让《周礼正义》，推崇备至。康有为说：“先生（孙）于礼学至博，独步海内。与吾虽有今古文之殊，然不能不叹美之。”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进而宣扬变法。梁启超说：“惊动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阔官的张香涛，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盖学术之争，变为政争矣。

三千之中，视我犹子

陈黻宸与马叙伦

陈黻宸字介石，晚更名芾（1859—1917年）世居瑞安城区会文里。他与同邑陈虬（志三），平阳宋恕（平子）称为“东瓯三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先后平阳龙湖书院、永嘉罗山书院、青山书院、三溪书院、乐群书院、乐清梅溪书院、上海速成学堂、时务学堂、杭州养正书塾、京师大学堂、浙江公学、两广方言学堂、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北京大学等处执教。著《中国通史》、《诸子通议》、《中国哲学史》、《饮水全集》、《饮水外集》等，著作等身。

陈氏在杭州养正书塾执教时，著名学者、教育家、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那时正在养正书塾读书，三班的历史课正是陈黻宸教的。陈氏是一位布衣布鞋的乡下老先生，一口温州话，真难听懂。陈老因言语不通，常写黑板字，以补言之不足或不懂。他“循循善诱”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法，马叙伦及其他的学生经他的启发，无不五体投地的皈依陈老了。

八国联军入侵，光绪与慈禧逃亡，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叙伦号啕大哭。陈老说“你不要哭，慢慢对你说”。于是就好像基督教徒相信“圣经”一样，正襟危坐，

洗耳恭听。他只在历史课里说到六朝五代和宋明亡国的事，学生们不知不觉地了解所处的时代了。陈老还布置在课外，看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王夫之的《黄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类的书，又使学生们不知不觉地懂得须要革命了。马叙伦说：“我的革命思想，是发生在十六岁那年读了一些书，有了民族民权两种观念的轮廓。”

一日，六个师范生即马叙伦、汤尔和、杜士珍等正陪着陈老先生吃晚饭，忽听到楼下饭厅里那位学正先生（类似现在的总务主任）要向监督建议，有傅振绅、王孚、徐景清三位同学与学正争吵起来，准备开除这三位同学。其他同学特别是高年级的同学都焦急了，大家都想办法，只有请总教习陈老先生设法营救。陈老一听要开除学生，便怒气冲冠，一口气跑进监督办公室。监督正手执朱笔要写开除学生的条子。陈老迫不及待地向监督说“不能”、“不能”。该监督说本监督自有权衡，该教习无得干涉。陈老的“无明火”自然烧起来了，便说：“我辞职罢！”这话一出，满校风雨，就有潮涌似的声音“陈先生辞职，我们也走！”六个师范生除了汤尔和在病外，也都被开除了。

陈老赴广东，任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任监督，马叙伦随之去，当教员。陈老当选为浙江咨议局正议长，要马回杭，帮他的忙。马回杭后，兼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员。

武昌起义了。马叙伦、汤尔和、楼守光三人便与陈老商量，在省城办民团，表面是自己防卫；实际是预备响应，陈老自然赞成，就在咨议局开成立大会。民团必须有枪械，才

有作用，由于巡抚增韞的拖延，又由于杭州的驻防守军把新式枪械都提了去，民团就不能成立。

在这过程中，马叙伦到了咨议局，副议长沈钧儒已在陈老的卧室，谈准备起义的事，要请汤寿潜从上海赶回来。由马起草电稿，陈老、沈老、与马自己都署名。沈老还提出加上诸辅成。当时就有一部分军队方面的人，到咨议局来办公，马叙伦便去刻了“浙军都督府都督之印”，立即应用。马去迎接汤寿潜。在人群中，劈头听见驻防协领贵林的口音。迎面而来的，是那时都督周承葵，八字式坐着，仍然是个大将军气概。陈黻宸和贵林对面坐着，汤尔和坐在周承葵的右边，任临时的书记，纸上已经写了不少条款。原来贵林是代表驻防出营来议降。他也全身“命服”，他倒侃侃不屈的在争某些条件，似乎难得解决。他看见汤老到来，立刻就说：

“汤老来了，汤老怎样说，我无不依从。”这时周承葵却不作声，起身迎让汤老就座。汤老也毫不谦让，看了条款便签字，大家都无话说，议降会议就此告终。汤老着手组织都督府，开了一张名单：民政司长陈黻宸、财政司长张鸿、教育司长沈钧儒、马叙伦与楼守光都是秘书。

原来，贵林的母亲受过旧式教育，叫贵林结交知名之士，遂交宋恕（平子）几乎以师事之。由于宋恕的介绍，结识了陈老。贵林在武昌起义后，曾向陈老请教。陈老告诉他：不可拘泥君臣之义，应该看在老百姓份上。並说，清朝的政治太腐败，没有希望了。贵林将其话转告其母亲，且邀请陈老去见其母亲。其母亲说：陈先生是至诚的君子，要听他的话。

民国成立后，陈老加入统一党、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

员，要马叙伦帮他私人的忙。陈老任北京大学教授，介绍马任北大教授。

袁世凯谋称帝，袁以十万金向陈老贿赂，要他率大学生上书劝进，遭到严词拒绝（李新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367页）

陈黻宸是马叙伦的尊敬业师，马叙伦是陈黻宸的得意门生，追随二十年，相依无间。在学术上，马著《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老子校诂》、《庄子义证》、《石屋余沈》、《石屋续沈》、《石鼓文疏记》、《读金器刻词》、《尚书释文校语补正》、《马叙伦言论集》、《马叙伦学术论文集》等。在政治上，马叙伦趋向革命，趋向民主。1946年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力于民主爱国运动。南京下关事件，垂名史册。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务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都是由陈黻宸教育启迪，打下了基础。

1917年陈黻宸在瑞安故里病逝，马闻讣，从北京奔瑞祭奠，其祭文云：“……三千之中，视我犹子。父事未能，亦吐肺腑。……忆我从师，于兹廿祀。南北东西，无往不侍。中或相离，日月焉耳。……一掬之诚，师是鉴之。海山万里，惟魂共之。”

马叙伦又作《陈先生墓表》曰：“……先生教人，诲之不倦。常设端启发。及学生有所悟，则申之以问难，而终沛然尽其所怀，以满学者之意而止。故从先生学者各以其资有所成就。……先生之主养正书塾也，教授历史，即陈夷夏文野之义。于五胡金元之迹，反复而不厌。又以孟柯、黄宗

羲之说，敷列于讲席之间。于是杭之学者，莫不盛张排满革命，而谈民治，风浸被于全浙。……京师大学堂聘为教习，为四方人才所萃。英俊之士闻先生之说，莫不兴起，至有投笔买剑，效荆轲、曹沫之所为者，辄夜就先生决。去事革命，先生每资助之……。



数学之乡，师承佳话

洪彦远与苏步青

洪彦远，字岷初，瑞安城关南门林宅巷人。早岁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国后，在杭州任两级师范学校教师，与鲁迅同事。后任温州中学校长，兼教数学。苏步青在温中学习时，洪教他那一班的几何学。洪辞职后，任教育部视学，又与鲁迅同事。

《人物》1983年第一期《数学大师苏步青》一文载：有一次，苏步青用二十种不同的方法证明了一条几何定理。校长洪岷初知道了，亲自把苏步青叫去，高兴地说：这孩子有出息。好好学习，将来送你去留学。到苏步青毕业时，洪校长已调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从北京寄二百块银元，资助苏步青出国。还写给苏步青几句赠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为中华富强而发奋！”

苏步青也没有忘记业师洪岷初。温州中学于1983年举行八十周年校庆时，苏步青写诗文纪念，其中有云：“岷老待我如幼子”。

洪岷初的墓志是苏步青写的。

上文又载：“1934年暑假，浙江大学数学系第一届

毕业生方德植（莘塍区南垟前埠人，任厦门大学数学系主任）是苏步青的学生，在苏教授的指导下，写成题为《定挠曲线的一个特征》的论文，对著名法国数学家达尔布的一个公式，作了重要改进。论文发表后，国内外许多数学家都把这一成果写进了教科书。苏步青高兴地说：“谁说中国培养不出人才？看！我们不是培养出来了吗？”

以上所说，洪彦远（岷初）教育培养了苏步青，成为数学大师。苏步青又教育培养了方德植，成为数学大师又可喜者，方德植任厦门大学数学系主任又教育培养了陈景润，陈景润又成为数学大师，名闻遐迩。师承佳话，播为美谈。

近年来瑞安中学应届毕业学生吴心绩参加全国中学数学竞赛，名列第一。今年吴甲富参加全国中学数学竞赛，名列全省第一。均为全国名牌大学争相吸收，免试入学。数学之乡，佳讯频传，令人振奋。



教泽流芳 高山仰止

伍叔傥与卢田孝胎

伍侗（1896—1966年），浙江瑞安仙降区上湖地方人。秉性倜傥不群。兄弟三人，长武伊，次仲费，侗居三，故字叔傥。

伍氏外家唐家由陶山区浦北山下迁居城区，叔傥常住城区唐家。少从乡儒周筱龄及乐清高性博游。又与少年文人洪锦龙（幼园）、周蘧（予同）、李笠（雁晴）、宋慈抱（墨庵）、李翹（孟楚）、薛钟斗（储石）、闾达（剑西）、许达（达初）、陈俊（逸人）等交，以洪锦龙为翹楚。锦龙年事较高，博学强记，其他九人以师事之。凡有疑难之处，必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在其熏陶之下，文风丕振。才华横溢，显露头角。伏案笔耕，颇多创见。唱酬之作，颇多传诵。于是，时人有“十才子”之称。此后，劳燕分飞，分道扬镳，蜚声文坛，各有千秋。执教大学者五人，任省通志馆编纂者一人，以琴棋书画闻名者二人，耆宿一人，颜夭者一人，亦有诗文传世。

伍氏壮岁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功底既深，好学深

思，得宿儒名师赞赏，谆谆善诱，其学益进。毕业后，得名师国学大师黄侃（季刚）之推荐介绍，破格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1925年“五卅运动”，圣约翰大学学生闻风热烈响应，悬挂中国国旗，半旗志哀。校长美人卜舛济坚决不许，将国旗扯下来。国旗遭到凌辱，全体师生义愤填膺，罢课抵抗，卒至全体学生毅然离校。华籍教授慷慨陈词，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其中，钱基博、孟宪承、伍倜、何仲英、蔡观明、洪北平、顾苾丞、林铁西、张振鏞、蒋湘青、吴邦伟、薛迪靖、于星海、朱荫璋、周予彦、金秋涛、陶士玮等17人同时辞职离校。伍倜名列第三。（见《民国春秋》双月刊1989年第一期）伍氏离开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

伍叔悦与朱家骅，有联襟友婿之谊。1935年，朱任教育部部长，伍任参事，兼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旋改任部视学，曾来瑞视察，到过瑞安中学。笔者见其容貌魁伟，风采奕奕，温雅雍穆，一学人也。1939年，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伍任秘书长。朱调，伍亦辞。后任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主任。随校移迁，抗战胜利后返宁。硕学名流，声望甚高。

1949年赴台湾，任“国立”台湾大学及“国立”师范大学教授，历十余年。转赴日本东京茶水女子大学任教授。若干时后，应聘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教授，直至1966年7月病逝香港，终年七十。杏坛春风，到处化雨。亦有慕名而来者。闻讯噩耗，识者深为悼念！

叔悦先生，名诗人也。工五古，长骈体文，为世所钦。他尝言，中国美文只读《后汉书》、《三国志》、《水经注》、《伽蓝记》、《颜氏家训》融会贯通，娴熟精研，足

够一生欣赏。所作诗文，随兴而发。潇洒豪放，意境高逸。不为著作而著述，不为问世而著述。人问其著作，他自曰：“我述而不作。”印有《暮远楼自选诗》一卷，实则崇基学院学生醵资为之刊行，经其过目而已。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卢田孝昭，伍氏在日本讲学时之学生也。1987年7月来华，特来温瞻仰伍氏故乡。教泽流芳，敬仰若此。

1989年4月7日



饮水思源，不忘其旧

金嵘轩与夏鼐

金嵘，字嵘轩，瑞安仙降区林垵人。早岁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国。“五四”运动后，与同里周予同、李笠、伍叔悦、李翘、王孝通等参加“知行社”。1921年起，历任浙江省立第十中学、第十师范学校、浙江省地方自治专修学校、江苏省立镇江中学、福建省立师范学校、浙江省立温州师范学校、瑞安中学等校教师、主任、校长等职。抗战时，深入永嘉山区，创办济时中学，独任其难。

建国后，继任温中校长，已是第三任，兼任浙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温州市政协副主席、温州副市长，并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市主任委员及省副主任等。

嵘老首任温中（十中）校长时，1924年夏间，国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十中附小读书，正是念旧制春季高小第三册的小学生，还差半年才好毕业。当时学制变革，允许跳过半年考初中的。夏鼐与同班级同学金志庄一起温习功课，准备应考。志庄是嵘老的次子。考期临近，有一次，志庄忽然对夏鼐说，他不准备投考了，因为他的父亲不让他报名投考。原来，嵘老将受任十中校长，以那年投考初中学生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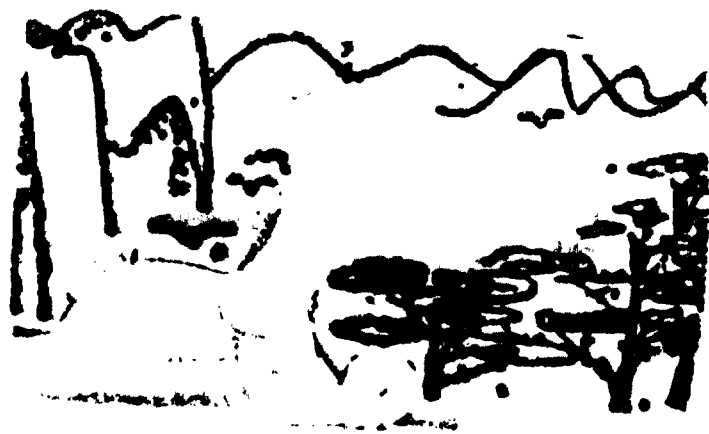
八百人之多，而录取仅一百名，大部分应届毕业生落第了，而还未毕业的校长的儿子居然考上了，人家将怀疑有私弊，致招物议。实际上志庄的学习成绩与夏鼐相伯仲，夏鼐考得上，志庄也可考得上的。嵘老的秉公精神，素为人所赞扬。这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更令人敬佩不已。

嵘老逝世，夏鼐缅怀先师，饮水思源，不忘其旧。撰《九山乡梦绕师门》以志纪念，并从北京寄示挽联：

绛帐追思，春草池塘犹昨梦。

素帷遥奠 燕山瓯水共含悲。

嵘老一生，教泽长存。1987年诞辰一百周年之日，温州市各界举行隆重纪念会，刊《瓣香集》，并建立“金嵘轩先生纪念碑”与纪念室。林家乡，建立嵘轩亭与图书馆，以垂久远，永志不忘云尔。



九十年来

林炜然

前言 我出生已历九十年了。岁月迭更，世事沧桑。曾摭拾遗闻轶事，撰文分别刊载在本刊第1——4辑。（本刊总目录将另附印）。另有他人在本刊或其他刊物发表的，本人都不复赘。兹又将我所亲历亲见的具体事实，凡足以反映旧时代的制度以至意识原形与逐步演变迹象的，则略依时间先后，加以叙述或补充。

惟远年事端，印象淡褪，间复错综复杂，虽曾认真探索，但衰年惫疲，难免仍有舛歧差误，切望阅者诸君不吝指正，以备方志采择。

一、与生俱来的赔款灾难

我出生于国都伦陷，联军进驻皇宫的清、光绪庚子（即前世纪末年）的秋季。那时京、津一带焚、掠、奸、杀，几成野兽世界。实际祸首悍妇那拉氏挟着囚徒皇帝西逃，沿

途还在苛索供应，恣肆威福。一面屈辱求和，订立了辛丑和约。该约出现了为人意想不到的逆反条款，如京师附近不得设防，以便侵略者随时进军占领；而内城使馆区却准常驻外国军队，成为国中之国。尤以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注）恰与我国当时人口总数相同。其用意显然认为满清政府这次可完全驯伏了；而义和团事件是人民的反抗，故以此表示：对每个人民作当头棒喝！

自鸦片战争后，我国曾多次对外赔款，但数字都不像这次之巨，即如马关条约所订的对日惊人款额也只当此半数。以16两当一斤计为二亿八千余万市斤，即14万余公吨。装满万吨巨舰，也须14趟以上才得运完。这是任何大国所能搜刮得出的，故订明：自签字日起以4厘计息，分40年偿清。国民中，如我的父亲虽与义和团风马无关，但也受此棒喝。他当时年近三十，还要到稀古岁月才得卸下负担。而我则刚一坠地，便在受这重压下生活，直到“四十而不惑！”

他们为获得40年长期的可靠支付还指定以关税作担保，从而附订了关税协定。由他们委任税务司直接征收。划清了每期赔款，多余的简称关余，才供我国政费。这一员司，超越了我政府的任免权和税收行政，甚至还可以控制我财政，并不是一般的客卿。还规定了税率，不问进口、出口，不分必需品、奢侈品一律值百抽五；直至赔款偿前不得有所增减。当时我国厘金弊政未除，货物经过各城镇都须抽税。而洋货却只附加2.5%的子口税就可畅通全国。这两款不只敞开洋货的倾销大门，还扼杀了我民族工业初步形成的可能性！

第一次大战，我国参加协约，但胜利后庚款也只苏联主

动抛弃，并取销对战败国未付之数。直至北伐胜利，帝国主义者才慑于我民气的高涨，因得废除这项条约，关税也得自主。但我今以耄耋之年，痛定思痛，念及百余年来，尤以此目睹之数十年中，侵略势力急剧渗透，导致内乱频承，民生凋疲，莫不直接或间接以此为厉阶。而痼疾既深，余毒难湔，还接着法西斯统治和日寇入侵。血雨腥风、惨怛萦怀，有不能已于言者！抑尤有进者：西方人生哲学者每以竞争奋进自诩，而且有色人种暮气深沉，不自奋拔。实则他们以大炮为先驱，制造单方优势，缚束别人的手脚，哪有平等竞争的事实可言！

注：该约汉文本为“四千五百兆两。”按：《礼记·内则》“降德于众兆民”《疏》“亿之数有大、小二法：其小数以十为等，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也；其大数以万为等，万万为亿，万亿曰兆。”此以小数计者，兆以上已无固定数名，故云：“四千五百。”翻以现代通行的大数计，则为文中之数。

二、杜志行老师

我並沒有从杜志行老师受过业，对他也只于十岁左右去街上约莫碰见过两三回。留下的印象只是当时唯一的没辫子大汉和穿短衣的知识份子，看不惯的人起他的绰号叫“半番”，叫“和尚儿。”此外也只听说他是瑞中的体操教员。然而80年来，我却一直在怀念他。我升学瑞中时，他离开已数年，而知道当时的老师不少是他的学生，应该尊称他为太老师。但当时的学生对各科功课的看法很不平等，以为

国、英、算是基本科，理、化、博物是必修科，而图、音、体则是“随意”科。而我却怎的会一直重视这位随意科教师呢？

为了透彻回答这样的问题，话只好扯得远些：——从遗留下的文物、绘画和文献记述，证明我们汉族女性缠足确有近千年的历史，而明、清两代尤为普遍。就我从小见过的长辈妇女，就是劳动家庭出身的，莫不是颤颤巍巍、金莲三寸的。农村妇女离开厨房也只能坐着纺纱、织布，从不下地种作。军阀时期，我在杭州想认识一下驻防旗人后裔，男性已根本无从辨认，而中年以上的妇女却只从缠足与否就一眼可以鉴别。——由此可以肯定：过去汉族人口中有一半是残废者！再就男性来说，知识份子由于伏案读书、写作、有十之七、八驼背，这是尽人相信的。它如农民，由于插秧、耘草、收割都要俯身工作，尤其挑重担，也是驼背的多。手工工人，不论锯、刨、凿，以及筑地、铺瓦，都要蹲着，也容易形成驼背。可见就是男性，也还有一半是畸形的。所以西人号我们为病夫之国，这却无冤无枉。天公地道的，不应随便怪人污蔑！

对于缠足，由于改良派人物的大声疾呼，切实劝导，到我们这辈总算陋疾尽除了。至于驼背，则由于一向没有经常的、适宜的工余体操随时矫正姿势，以致积成了职业病。我国以往并不是没有传统的运动，但外功拳只在锻炼体力，姑不具论。就是内功拳，固然全身活动，增强健康，为西洋一切运动所不及。但由于为避免外来打击的伤害，而采取弧形的、有弹性的函胸援背的姿势，这就无助于驼背的矫正。又由于利用反动力以制御对方而姿势能迅速应付变动，故要求

动作连绵不断。这对动作就难于解剖分析，说明矫正的要点和方式。直到丙午、丁未（1906—1907年）之间，杜老师来瑞任教，（注一）引进了西洋的各个体操，才第一个重视了身体各部位的正常姿势，注意矫正了驼背恶习。

我虽没直接见到杜老师的教学实况，但我的体育老师郁志远先生是他的高足，全面继承了他的衣钵。郁老师十分重视各个体操，对全体学生要求动作切实，姿势正确。尤其对最基本的立整姿势更其严格，随时予以纠正。虽然同学们嫌这项运动单调乏味，但他总是不惮烦地分别说明各种动作的目的，要求，有时还举例说明它的实用价值，尽可能启发了大家的兴趣。由于杜老师矫正了他一辈（注二）而他们再矫正了我们；我们又分散到各地任教，传播，对人民健康有所裨益。（注三）

杜老师在瑞五、六年之久，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就前往参军。接着又得传闻：他当年就在前线牺牲了！由此，我们才得想：他早就是军人的革命组织日知会成员，并推知：他取名的意思是“志在实行。”

注一：听说当时瑞中总理孙诒让向上海、南通等处物色体操教员无着。那时黄绍箕虽已就任湖北提学使，但仍关心瑞中校务。而杜是湖北江夏人，黄又与日知会通声气，所以很可能是黄物色到的。

注二：杜老师也同时引进了田径运动，并整治该校操场（现总工会地址）创设跑道、沙坑。他对全体学生田径运动要求达到一定水平，以利生活，但不在于培养选手，争取奖牌。那时篮、排球尚未推广，只去四陌巷坦（“陌巷”是常语，但“陌”字被误念“百”音，因

而跟着写错。现为机械厂厂址)训练足球。

注三：但反对的势力也不小。尤其他后来在德象女小兼课，因而一个老学究说：“把女子教成函胸，正是将来克夫之相。”有个兑糖客甚至污蔑地念着顺口溜：

“动手亦动脚，女学生奶奶胡乱捏！”

三、捣毁无常殿

“无常”本是佛家的哲学术语，意思是：事物都要经过生、住、异、灭的四相演变，不可能常住的。所以“无常迅速”这话是警惕僧众们：人生一世演变到老死是很容易的，故必须勤事修、持（修行、持戒），今生才得成正果。还塑立了抢眉、瞪眼、悬咀、吐舌的人像，象征这一意义。后来世俗佛教才有：人的死亡乃是阎王派无常鬼来摄取了灵魂的神话。

瑞安丰积仓（现为三八粮店地址）内也建有无常殿。丰积仓本是公立的福利机构，丰年购贮粮食以免谷贱伤农，荒年平价出粜以维民食，平年只在推陈换新。大约由于管仓的大使变成了“仓老鼠”，所以神道设教者于这里建立此殿以资恫吓制止。据说该殿里的木像非但形象可怕，而且是活动的。你倘抱住它的腿虔诚祷求，它就会扑向前去，挥着手里的扇子，拂除了笼罩在你身上的妖气或晦气。因而住在殿里的庙居就借此敛钱。

这位无常伯会钻着人们对自己的事欠缺智力作该行该止判断的孔子，干涉、包办他们的婚姻、就业以至诉讼、医药等事。对于捺花会，推牌九，也只要你向它许了愿，就会丧

失正直立场，徇私地帮你胜利发财。甚至会接受你的咒诅，叫你的怨家仇敌遭灾死亡。尤其它面前金炉里的香灰能治百病。香灰具有五味，由于疾病的不同，求得的有甜、酸、苦、辣等味。偶然病愈，你当然会对它大捧其场；就是误过的、死了的，也只怪自己孽重，不得消恕，决不敢进一步开罪于它。因而特别见得威灵显赫，流毒社会！

记得是丁未（一907）年，留洋的和在外地求学的青年孙公权（衡）、朱质夫（受西）、林左髓（文潜）、郭仲宣、肖亦陶（侃）、薛仲葵（达）等十多人，当暑假回里时向知县张学志要求将该像毁掉，并发封该殿。张虽是同意神道设教的儒者，但对这种淫祀却也深恶痛绝，即朱谕县差跟着青年们前往执行。但公差们到得殿来见到神像，却直着手不敢动。同时那“庙居”也鼓动附近愚民围在殿前，咆哮反对。于是青年们只好自己动手，将神像拖到仓前晒谷场把它烧了。但看到当场愚民们的情势，大家估计就是前门封掉仍有开后门的可能。于是决计趁此把庙整个毁掉，以绝后患。但这些文弱书生，虽然掀了瓦，破了壁，对那木构建筑简直没法动摇。还是薛仲葵建议：先将前面两条木柱锯断，再用绳索络在玄梁上，十几个人像拔扈样地向前尽力拉去，才整个塌了下来。

——这是本市近代轰动一时的首次破除神鬼迷信的一幕。但还有一段余波，就是孙、朱、林、郭四人于事后数年相继夭折了。那庙居就宣传是无常报复。尤其带头的孙公权患的癫痫症，时常突然晕厥仆地，活像传说中无常扑鬼的模样，更被证明是显示无常附身的现眼报。但却没法解释：设计彻底毁殿，根绝了它复兴可能的薛仲葵，却健康地活到

70多岁。薛世居西门街，后以国画知名，孙传芳入浙时曾任汤溪县知事。

四、太久保罐头牛肉

清光绪甲辰（1904）年，瑞安普通学堂因经费支绌停办，好些学生赴日留学。当时留日的以学军事政治、经济、师范为多，而瑞安则由于黄绍箕的劝导，学的多是科技。李墨西（祖林）前辈也赴日学食品工业。

宣统改元（1909年）学部举行留学生毕业回国考试，甲等第一名是本市的林大闾。次年殿试，一等第一名又是本市的项骧。除项骧、林大闾都点翰林院编修，黄曾铭、薛楷都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外，其余分别赏给各科进士、举人的近20许人。除学军事和师范的因各省都在推广新军和建立学校得即时安排专业职务外，学科技的则由于当时我国仅有的一些产业也都操在外人手中，只好任用为与所学有关的行政官。李则由于学的是轻工业，故得以私资假故乡北门外本寂寺创设太久保罐头厂。该厂规模虽小，但对水果、水产、禽畜都有制品，而以枇杷，尤其牛肉著称。

由于瑞安当时还没有机械工人，故自日本雇来技工二人。去机械屠牛时，因人手不足，李时常亲自参加操作。一次，我去外祖父客座旁听到李的尊人漱梅老先生提起这事，风趣地说：“若川拉世兄学矿，未庸拉世兄学电，……都是国家急需的人材。而我拉小儿也出洋，学的竟是一一剔牛！”（注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这事的观感。又该厂出的牛肉所以特别鲜美，据说：主要是调味的酱油系他据祖传家

法亲自监制的。（注二）至于枇杷，原料是杭州坑栖产品。赶运到瑞，连夜制作。（注三）——在此都可见他艰苦创业的精神。此外他为搞好罐外贴的招纸，另假西山文昌阁创立务本石印公司。当时鹰牌炼乳的罐面招纸还是兰色单色的，他却于这时试印彩色。搞成了当时别致的装潢。——这又可见他精益求精的努力。可惜的是该厂出品当时在温州地区已供不应求，未曾进一步向外地宣传推广，而他旋即于民国初年病故，工厂也就此停歇了！

隔了数年，该厂设备虽经钟志三君顶受复活，但只维持原状。枇杷既因运输困难停制，牛肉则照旧制造。1929年，我在省立水产学校任教，该校制造科也附设有罐头厂，曾带几听牛肉给该厂技术员。那时一般已用外嵌卷筒罐，他俩见到我带来的还是内嵌焊封罐，就先露鄙夷神色。到了开罐一尝，就说：确比泰康的鲜美。又见切的薄片纤维都是横断的不缠牙，烤制也软而不散，才转口啧啧称善。他俩原拟来瑞实地了解，但因该校易长，彼此都离开了，故没下文。钟易接办该厂，后因抗日起停歇了，因而大家对该厂的印象就逐步淡忘了。

解放后，我虽曾与有关同志提起，希予发掘。但大家都以为半世纪前的事啦，未予注意。但我仍然认为：凡发现历史上一善足取的事都应该虚心发掘。何况推陈每每出新，古为今用岂可忽视。至于片面的“昔不如今”的看法却会阻碍了前进！

注一：若川，林大闾之父的字；未庸，黄曾铭之父的字；拉，等于说“家的”；世兄，对友人之子的谦称；剔，口语音“推”。

注二：小生产时代，生活水准较高的人家每有秘法自制食品，较市上出售的优良。

注三：所以没有就近运制黄岩桔是因为那时这种产品别地尚未知名。对它，后来上海还长期地讹称天台蜜桔。

五、三位学堂出身的老师

宣统二（1910）年，我在城区外西北小学（现三小）修业。那时的教师还是科举秀才为多，但有三位是瑞安普通学堂出身的。幼小的心灵也模糊地感到他们是有些两样的：

一次，国文教师病假，由格致科（辛亥革命后改称自然科）教师胡幼玉（演元）先生代课，首次发给我们的自选教材是黄宗羲《原君》。文里几句总结的警句说：这些皇帝们“以为天下利害之权尽属于我，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委于人……。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就把原任教师多次塞给我们，而植根不深的尊君、忠君的教条一扫尽净，觉得面目一新，振奋得很！后来才了解到：他当学生时的历史教师姓洪的宁波人是明遗民万斯同系的学者，光复会成员，曾把私印的清代禁书《明夷待访录》介绍给他们阅读。次年辛亥上春，小皇帝开蒙上学，通电举行祝典，发生了我班小朋友不肯向所谓圣位跪拜的事，（详见本刊第一期《辛亥革命在瑞安》）显然是受此影响。后来我升学瑞中，胡老师任瑞中校长。

经学教师王云龙（疏）先生是胡的同学，教材是《孟子》。他讲的几乎全书贯穿着“民贵君轻”和“辅世长民”八个大字。对后四字，他很欣赏：从“不违农时”做起，解决人民生活问题；进而“谨庠序之教”，提高了文化，以达到“保民而王”的目的。他把“保民而王”借古说今地解释为：“替百姓办事才得到百姓拥戴”。

地理教师薛友右（演中）先生也是普通学堂学生出身。他用的教材是全国游记式的，教到任何地方，都联系到与该地有关的外侮事件。当时正在日俄战后不久，在教到东北三省时，愤慨地说：“两个外国无视我们的主权，在我们国土里作战，我们即使无力驱走他们，也应该抵死抗议。不料朝廷却宣布了‘严守局外中立’。这岂只是国耻，简直已丧尽国格了！”有两个小朋友听得不自觉地同时拍了桌子。

——就是这一批教师，播下了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的种子。（待续）

古道热肠 泽惠乡里

——记我省早期铁路工程、
水利专家林大同

沈肇瑞

抗日战争前，凡温州人到杭州去的莫不知道旅杭温州同乡会会长林大同。他古道热肠，泽惠乡里，人们至今赞誉不已。他还是浙江省早期的一位铁路工程、水利专家。

林大同（1882—1938）字同庄，瑞安市城关镇人，一八八二年出生在书香门第的家庭里。与祖父同日生，故谱名祖同。祖上虽无大官显宦，也是望族，人们惯以地名带称曰“学前林”。到二十岁时，慕礼运大同之义，改名大同。他幼年是不幸的，父亲中过秀才后不久便去世了，赖二叔父把他抚育成人。大同居长，少时聪颖，举止异常，无他好，独嗜书，与诸弟极友爱，深得同里黄仲弢（绍箕）、胡筱玉（宝仁）诸名宿的赏识。年十九与胡夫人结婚。时值庚子之乱，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他深慨清廷腐败，目击时艰，遂负笈求学沪上，考入南洋公学特班，与项襄（瑞安人）、邵力子、于右任、谢无量等同为特班生，人才之盛、得未曾

有，并从沈寐叟（曾植）为师。学习年余，特班停办。适瑞安巨族学子掀起了游学东瀛的热潮，林大同亦于1902年东渡日本考入宏文书院普通科，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科，宣统元年毕业归国，在浙江铁路公司任工程师。这一年的秋天，应清廷留学生考试，中式举人，时年二十二岁。翌年，廷试一等，授内阁中书。他认为这种虚衔，无补实事，便放弃就职，仍返回浙江铁路公司，重理他孜孜以求与国计民生攸关的实业工作了。在职期间，林大同对事无大小，必躬亲之，筭路篮缕，辛苦经营，曾监督兴建了第一个杭城火车站。还建设过杭嘉段铁路工程，并且勘测浙赣路常山、玉山间的路线，大大地促进了这条铁路的建成。1914年，浙江铁路收归国有，总公司改为沪杭甬铁路局，不料，大同因公初谒某局长时，某竟以短衣出见，他恶其不文明、遂拂袖而归。

林大同以学贯中西，知识渊博，知名度很高，受到各界的青睐。1915年，浙江巡按使闻其名，授命组织我省最早的水利机构——水利委员会，一切规程皆出其手。委员会成立时，他以技正兼任主任，集技术、行政于一身，足见上级倚重之殷。委员会系负责全省河流浚治工作事宜，故在成立之初，首先要进行勘测，设有三个测量队，分驻浙东、浙西。在职十余年中，经他勘测的河道甚多：如余杭之南湖、北湖；湖州之苕溪、碧浪湖及七十三淙港；嘉兴之泖湖、萧山之湘湖、附子湖；上虞之山楂湖、温州之瓯江、临海之灵江、绍兴之曹娥江等均经测定并绘成详图。在当时历时条件下，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测绘工作，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同时还拟订疏治计划，为后来整治水利者作为张本。此外，他曾

与江苏省府会勘了太湖水利设施。

林大同对我省水利事业抱有高度的责任感，凡有妨害水利的行为，莫不深恶痛绝。当时浙东的东线、山渣、附子等湖流，因年久失浚，渐形淤埋，一些巨绅不图疏浚而贪眼前和局部利益，建议招农放垦，他认为这样将使以后无法治淤，招致数以万计的农田不能受益灌溉。便坚决反对，使淤河放垦之事得到了有效的制止。又如当时犹太巨商哈同挟帝国主义势力，喧赫一时，筑罗苑于西湖，侵占湖面，人莫敢撻其锋，独林大同曾多次呈报省府严饬拆除。他说：“此例一开，势豪相率效尤，湖面必日蹙，湖身必日淤，杭州四乡平时既失潴蓄，遇早无可涸注，则氾滥凶荒必相因而至。”他的建议虽未被采纳执行，但豪强之势亦稍戢。他的这一段话，至今还可以作为殷鉴。

1919年林大同为补救水利设施之不足，曾倡导广开水井，以资涸注。经选派一批工人前往北京农林传习所学习凿井业务，学成后，即派各地凿井，颇著效益。沈寐叟见到绍兴一井后，曾撰《玻璃铭》以记其事。

二十年代以后，林大同先后担任过钱塘工程局局长、钱塘江塘岸工程处处长兼浙江水利局局长。这段期间，他测绘了浦阳江全图，修筑了海宁险塘工程四所，完成钱塘江挑水坎两道，疏浚浙西河流五处，昼夜筹划，备增辛劳。为抗旱防涝，扩大农田受益，作出了重要贡献。

林大同长期为旅杭同乡服务，成绩卓著，也为人们所熟知。清末民初，温州旅杭垦植的农民数以万计，而在各界服务的亦不下千人。象这样庞大的旅杭人员，向无联络集会之所，林大同有鉴及此，但苦乏经费，一时难能筹办。1921年

间，适温州商人因赈灾向江苏、安徽一带采办大米，以批准免税后因运输逾期，复被海关扣押，罚税甚巨。他与温籍著名人士吕文起、潘鉴宗请省当局电部力争，始将大米发还，商人感激不已，遂捐款15000元作为筹建同乡会基金，并由他的倡导，又募到大批捐款，以28500元在杭州市原新市场花市路购置巨厦，作为会（馆）所。林大同先后被累举为旅杭温州同乡会会长达十五年之久，每隔一、二日必到会视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内援乡里之急，外舒侨民之困。他家中每日来往的同乡客人甚多，招待膳食而无吝色，人们至今称道不置；又如瑞安籍某生，在杭求学期间，因家境清贫，每逢寒、暑假，林大同必留馆给以伙食；再如著名书法家瑞安邹梦禅也是由他介绍给马一浮在文澜阁工作，自学成材的。

1919年，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瑞安城市平民发动了闹米风潮的斗争。群起“拖洋油箱”罢市，反抗奸商“漏海”，捣毁米店和商会及鲍漱泉住宅。奸商勾结官府逮捕了所谓肇事者罗碎奶等数十人，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当时省长齐耀珊闻悉后，欲派温籍绅耆前往平息，经省府沈秘书长的建议，决定派林大同去查明办理，并谓大同物望不减徐班老，（即永嘉徐定超）徐以名进士任监察御史，声望甚隆，时已卒。林大同名望几与徐相埒，这是他平日竭诚为乡里服务分不开的。他固不负所望，赴瑞安平反了冤狱十数起，解民于囹圄之中，深得上级的嘉许，为特保荐于大总统，保案中有“林大同不特学有专长，克尽厥职，其气节之高尚，尤为当今不可多得”之语。至今传为嘉话。

被誉为中国书法界泰斗、东南读书种子的马一浮，与瑞

安故旧有着深切的交情，对瑞安遗闻轶事非常熟识，孙孟晋挽他联中有“乡邦掌故罢交谈？”之语。其实马一浮与瑞安人交游中最深的要数林大同了。自辛亥革命以后，马一浮一直蛰居在杭州，以作诗、研究佛学、书法自娱，他很早就与林大同结下了翰墨因缘。并且由于大同的关系，马一浮得常游沈寐叟之门。大同善书法，用笔波磔，得章草之神，与马一浮甚相似，同受沈寐叟的书学影响。大同所书的扇面，韵致特佳，人皆宝之；尤善写八行笺，无剩行，字里行间，亲切洋溢，无赘语，人称绝诣。此外，他与弘一法师（李叔同）也有多年的方外之交。弘一法师以绝代才华看破红尘，在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没有多久，他听林大同之言，慕永嘉山水清华，气候温和，卓锡于庆福寺，居“城下寮”达十二年之久。为禅林添一史话。

抗日战争发生后的第二年，马一浮从杭州避地江西，林大同已先卒。大同哲嗣镜平适在江西任医学院教授，以父执关系，时有过从。当马一浮将往广东时，镜平亦送至赣州而别。隔了两年，镜平有诗奉怀，马有《林答镜平 见 怀》之作，诗序中备述两家交情，中有“居杭二十年”，与大同“无逾旬不相见”。镜平“为人真挚坦易，有父风，书法酷肖其父，以医术自给”，“既嘉其笃旧，复喜其能诗，书以答之”之语，诗云：

垂老何心作远游，故人有子慰离愁。
传家笔势鹅能换，系肘神方术可求。
佛是医王因病现，智如火聚愿兵休。
书来一别沧江晚，忽忆杭州又赣州。

林大同生平治学瓣香宋儒止斋、水心二氏，曾以孙衣言所书“务求知古如君举，尤喜能文似水心”联语张于座右，并以鉴止水名其斋，著有笔记若干卷，有浙江同乡会印本；此书摭拾旧闻，所记多乡邦掌故，非《齐谐》《夷坚志》怪异一类小说笔记可比，深有裨于文献；又拓辑《瑞安林氏印存》五册，藏印原为青田端木氏国瑚、百禄父子物，百禄初配林氏，来瑞每主林氏，阅数十年后，大同得其遗物，辑为此编。其中陈鸿寿、赵次闲、徐三庚所治印尤为珍贵。在四十年前，笔者曾目睹斯编。至今犹记得赵次闲因国瑚手掌有“井”字纹，为刻“井伯”白文，绝似汉印，并使我们第一次知道端木氏还有别号“井伯”，可补史料之缺。过眼云烟，辄为希慕不已。

林大同于1938年与世长辞，卒年五十七，葬于杭州，马一浮为书墓碑。



书法家项廷珍

唐 唯 逸

项廷珍（1879—1958年），字子贞，又名熙铨，瑞安城区南门西麓江底人。清廪生，游学日本，结识梁启超，介绍之入进步党。赠镇纸铜尺一对，上刻“进步党”三字，乃南海康有为手笔也。先生归里后，提倡新学，劝剪辮，戒缠足，甚力。辛亥革命起，温州成立军政府，派先生与黄曾枚、项肩、薛同等六人返瑞，组织新政权，被任管教育事。因推行新政，得罪豪门巨族，谣诼蜂起，愤而铤职。从此杜门习静，与乡前辈蔡怡仲先生游。蔡氏擅书法，从学甚勤。或问所师何人？先生必整襟而答曰：蔡怡仲是我师也。其尊师乃尔。

先生与书法家孙诒泽仲闾先生友善，朝夕过从，互相观摩。孙氏藏拙于巧。项氏藏巧于拙，均得古趣，各有千秋。或问先生，所学何碑，笑而不答。盖先生临碑甚多，融会贯通，不能执一。或有欲观先生临池，学其执笔之法，虽竟日随从，而终不得一见者。先生习惯于黎明即起，清茶一杯后，即取其家人所研墨书之。执笔取拨镫法，其雄健，是其工力之深，非有特殊之法也。其所用笔，皆长锋羊毫，硬笔在所不取。

先生所临碑本，园笔以郑文公碑为主，馀如司马敬和妻墓志铭等。方笔临张黑女，张孟然等。大字喜临郑中岳登云峰山诗及金刚经等。草书以孙过庭书谱为根抵，旁及张旭、怀素诸狂草章草晚月仪为多，馀如皇象、钟繇其他诸作，莫不一一临之。大篆则石鼓文、散氏盘铭。小篆临李斯峰山碑等。至于唐宋以下草书，学米南宫，如元之赵孟頫，明之文征明，等仅供参考。惟于赵之谦之笔法，每多学之，取其中锋，去其伪锋而已。

编者按：本文作者于其生前，1988年 11 月25日应约惠下，今日刊出，人已作古，可称遗作。子贞先生是其外舅也。

游仙岩

池 志 澂

不到仙岩四十年，溪山第一尚依然。
楼台已改丛林旧，钟鼓争迎法衲贤。
礼部荒祠无片瓦，梅潭终古有寒泉。
老来阅尽荣枯事，笑对弥陀我欲禅。

忆生物学界前辈诗人李逸伶

许世铮



一九八八年四月，有客自宝岛归，携回台湾出版社出版《李逸伶诗集》，故乡人士，辄互相传阅，威佩其亮节高风，天才横逸；至于印刷精良，尚其余事。此诗集由李先生之子森南编注，李雁晴教授作序。森南执教台湾中原大学，孝思不匮，为先人遗作付梓，乃印此集，以流传于世，旅台旧日学生施化常、苏步臬、王益滔、林品石、萧铮、孙铮与当代学人陈立夫、徐可、阮毅成等皆予高度评价和敬佩。我们捧读之下，不啻如坐春风，重聆教诲，而鼓舞不已。

李逸伶先生名俞（1880—1946年），瑞安浦后街人，才思敏捷，词章俊逸，早在少年时代，即以写诗，崭露头角，呈现诗才。这缘于出生书香门第，自高曾祖父以来，皆蜚声庠序。他十六岁即考取秀才。光绪末年，西学渐兴，清廷废科举、兴学校，先生负笈杭垣，考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优级博物科。宣统元年毕业，应聘温州中学兼温州师范博物课，

连续十年，奠定了温州府各校生物学科的基础。

先生勤奋自学，精于生物、诗词外，凡文史、音律百家之书，一经过目，辄洞悉其要。其于《诗经》、《楚辞》中，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的名称，对照现代学名，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至于剑术昆曲弹词琴箫亦甚爱好，又精通中医，擅长草药，常为人治病济世。曾以疗民疾病，救国疮痍，作自我之期许。

先生离任温中教席时，曾在郡城创设慧济医学社，招生授徒，讲授中国医学，当日温州有很多中医师皆出于门下。其后又创办《嘉报》，日出一大张，其中文艺杂稿，多出其手笔，内容丰富多采，深受市民欢迎，终因人力财力难继而停刊。三十年代初，瑞安县县长陈成，编修县志，特聘先生编写县志物产门，他认真负责，查阅文献，下乡采访，必求翔实。对瑞安动植物、矿产分门别类，列出表格，注以拉丁文；尤其对农作物林木家禽家畜，按形态特征，用途产地，记述特详，至今仍为温属各县修志者参考。

三十年来，先生历任温中、温师、女中、瓯中、瑞中、浙南中学等校生物语文教师，作育人材，忠诚于教育事业，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他为祖国培养人才，作出了出色贡献，深受后学者敬慕。在教学中联系实际，重观察与实验，采制标本，艰苦勤俭的作风，都留给人们深刻印象。惟性情高傲弗屈，拙于求人，虽学识渊博，仍不免失业之苦。家境清贫，经常生活维艰，他却能不改其乐。

二十年代末，我就读瑞中，先生为我生物学启蒙师。他在教学上不是照本宣讲，也不是只摘笔记，而是结合本地物产，深入浅出，既条理清晰容易领会，又生动活泼，引人入

胜，受到同学们欢迎。常于星期日带领几个对生物有兴趣同学，出县城之北门，沿锦湖至愚溪，或到万松山、滴水岩一带采集标本，当时曾采过想思豆、捕蝇草、竹节虫、燕尾蛾及海月贝壳，随采随介绍名称性状用途和所属科名，耐心细致，激发了我们学生物农学的志趣。

以后在四十年代，常告诫我们，生物教师不仅要精通教材，教好学生，还要多认识花草、农作物、昆虫、鸟兽等名称；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同时生物教师要爱生物，自己动手饲养小动物，栽种花木瓜果，制作标本，多做实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潜移默化，推己及人，培养学生兴趣，这些经验之谈，值得我们永记。

先生晚年家居颐养，故居有祖遗假山一座，亭台楼阁，花木扶疏；有池一方，养有红鲤，自住山后，“卷石山房”，小筑三间，陈列书画琴箫标本等，颇有名士风。常作诗以自娱以见志。内容有纪游、写景、叙交情、抒情性等 方面佳品，但也不乏忧国忧民诗句，其中咏竹诗：“托根难免在泥中，万卉风标各不同，为有虚心存劲节，却教岁寒友乔松”。此其自况也。

八年抗战，瑞安四次沦陷，前线战事方殷，敌机时来轰炸温瑞，先生避机至郊区，有荒村晚眺一首：“红树青山似旧时，荒村古庙夕阳迟，寒鸦不管人间事，三五成群啾啾飞”。其中“锦湖采药行”一首，470余字，写到植物名四十余种。关怀祖国抗日前途，同情人民疾苦，厌恶纸币贬值，物价飞涨，有“……吁嗟战争今方烈，米珠薪桂药物缺，最后胜利虽可操，目前艰苦殊称绝，既书放翁愤慨诗，仍须庄子逍遥诀，忆昔少壮苦风尘，及今憔悴玩岁月，手携

药篮重行行，度己济人究学术……”。

1945年抗日胜利，先生欣喜若狂，其时已六十五岁，自觉精力衰退，但豪情犹在，吟兴未减，献其余热，复应老友邀请，执教于平阳浙南中学，次年端午节，患病回家医疗，诊为胃癌，无法挽救，子少逸森南在侧，逝世前八小时，饮开水以止渴，作临终诗一首：“临终物质就清凉，无味清泉可作方，冷暖寒温随意吃，自无烦恼自无狂”。

先生道德文章，士林共仰，四十岁后，多在清贫和淡泊中生活，常徜徉于山水之间，逍遥自在，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也是海人不倦桃李成蹊的教师。临终之时，犹嘱其哲嗣森南安贫乐道，一生以教育为职志。兹录其瑞安放翁亭联句，以作本文之结束：

旧址作新亭，故国犹留乔木在
小城临古渡，诗人谁继放翁来

献身科学 重视实验

——悼念瑞安籍生物学家曾省教授

曾衍霖

曾省教授是我的二叔父。抗美援朝初期，我正在浙江大学学习。为了配合反细菌战，我编译过一篇“怎样正确合理地使用DDT”的科普文章，发表在《医药学》杂志上。出于意料，我为此受到二叔的严厉批评；主要精神是：学习自然科学，一定要亲自努力进行实验，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真正联系我国实际，为人民作出贡献。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中国科学院，一直从事科研工作。我单位的四清运动，查实验记录、批判弄虚作假是一项很重要内容。清查、我的实验记录在我的研究室里是最过得硬的；我能通过群众运动的严格考验，不能说与二叔的教导无关。当然，大学生写些科普文章也是有益的工作；但要真正为革命及建设作出贡献，确实应该亲自进行实验研究。例如DDT的喷洒剂量，便与昆虫的种棕以及对药物的敏感性有关。未进行实际测定，仅仅引用一些国外资料，很难做到“正确合理地”使用。

家祖父逝世时，家父仅五岁，二叔三岁。通过刻苦学习，二叔及三叔曾勉才相继成长为闻名的农学家。祖父有一

张横幅遗墨“克勤克俭，惟读惟耕”；父辈对这张遗墨非常重视。抗战时，曾省任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期间，曾创办过一所中等农业专科学校；根据祖父遗墨精神，他曾亲自为该校大门撰写对联。上联是“手脑并用”，下联是“耕读兼施”；再次说明曾省的治学精神与教育观点。

解放初期，河南省小麦吸浆虫为害甚烈；当时曾省任中南农业研究所筹备主任，曾亲率科技人员赴豫，实地开展防治工作，成绩卓著。他的专著《小麦吸浆虫》，就是这一时期的经验总结。60年代后，他调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研究员，积极倡导生物防治，希望减轻农药对人畜生存环境的有害影响。他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虫生微生物及其利用》一文，是我国有关科学领域内的较早论著。他的远见卓识，以及他的重视实验的严谨学风，使他在寄生蝇的科研工作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二叔重视科学实验，也可能是他师承秉志的学风有关。秉志教授是中国生物科学的开山鼻祖，一向重视调查研究。我国生物学界的许多老前辈，都是他的入室弟子。抗战前秉志教授曾二次亲率学生来瑞安，采集海洋生物标本。儿时听家人告称，当时采集到的大海龟，有八仙桌桌面一样大。据张孟闻教授著：“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始末”（上海科技报1985年7月8日）中记载：“鉴于国外覬觐我国水产者众多，于是先集中精力从事长江下游与东南沿海的物类调查。1929至1930年得论文25篇。又“另成长江动物志初稿三厚册。沿海动物图录、南京植物通志、浙江植物志略，皆已成帙。”从这些著作中，有可能查到当年瑞安海洋生物的科学资料，寄望瑞安籍的生物学家，能在这方面作些考证工作。瑞安市

志中可能文史资料较多；其实瑞安不乏自然科学方面的杰出学者，与瑞安有关的自然科学史材料，亟待收集，以免失传。

除了重视实验外，曾省也重视图书期刊中的前人经验。他喜欢读书，也喜欢买书。他原任山东大学农学院院长，抗战前夕调任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当年时局动荡，他曾将六大箱外文书刊运回瑞安老家保藏。这些书刊，他很爱惜；每年都寄钱托人翻晒。日寇流窜瑞安二次，这些书刊也曾转移到陶山区渡头村二次。由于父辈的重视关心，这批书刊基本上保藏良好。1955年家母去世，遵照瑞中领导指示，我接家父去沪就医；因乏人保管，这批图书才由曾省出资，由我经办，运往武汉，后来分赠有关科研机构；其中一部份赠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记得当时《科学报》曾有报导。曾省热爱科学、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高尚品德，于此可见一斑。

1988年7月11日定稿于北京花园村半截塔1号，经委培训中心。

“七·七”抗战片断回忆纪要

——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浙江分会

瑞安市联络小组供稿

郑万民同学对“七·七”抗战经历的 片断回忆纪要

郑万民口述 李宪章 陈刚整理笔录

现年82岁高龄的郑万民同学，远在1934年毕业于浙江省士官训练团。团长俞济时。随后编为58师，他被俞济时师长擢升为347团机枪三连准尉排附。翌年，机枪三连奉命驻守武汉布防，唯一任务——负责监视日租界日军行动。历时二年余，郑同学未尝稍懈职守。

1937年“7·7”抗战序幕揭开时，58师移驻上海大场、曹皇庙一带参加“8·13”战役，持续与日军激战到同年十二月二日。在这段时间里，9月下旬某日，日军炮击我阵地连续七个小时，但炮弹全部没有爆炸。半个月后，敌我两军阵地相距仅100多米，可以对话。我值班军士听到操东北口音的敌酋拉开嗓子在唱京戏，骂他为“卖国贼”。这个

敌酋笑着说：“我们同是炎黄子孙，为了民族存亡，炮击时，每颗炮弹都没安上信管；否则，你们一团人都将被消灭”。接着他又说：“为了这桩事，日军头目怀疑我是个东北籍人，就被调充步兵连队长了。”郑同学说到这个动人魂魄的往事，至今记忆犹新，啧啧赞叹。

同年十月中旬一个夜晚，敌军偷袭我机枪连阵地。郑万民同学率领重机枪一个班，发现敌军偷剪我铁丝网时，立即发动射击，当时击毙敌军27人。过了几天，连长传令炊事班四个人抢运敌尸，每人犒赏30银元。因敌尸已腐烂，臭气熏天，四个炊事员都中了毒。幸经驻队军医精心治疗获痊。

1937年12月7日，58师奉命退守南京。8日凌晨4.30时，郑同学带领重机枪一个班作后卫，他单独蜷着身子匍匐爬上牛头山窥视敌军行动，发现日军一轻机枪手正准备向我方发射时刻，乘敌不备的瞬间，奋身拉住敌后踝将他摔下山坡，并夺来一挺轻机枪绕小路归防地。得到营长王章龙（浙江永康人）传令嘉奖。当日下午四时许，他在羊角山阵地被敌军击伤。身穿二颗子弹，迄今五十年来尚留在左肋下未及取出。

受伤后，转到湖北宜昌133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出院，编为50师300团升任少尉排长。旋又参加长沙第一次大战，在长沙杨柳洞再度负伤。初住第五后方医院，随后转入黄埔军校二分校荣誉军官大队受训一年六个月。

抗战胜利时，他认为卫国战争业已结束，历史赋予他的光荣任务已初步完成了，便退役离去部队回家乡从事农业生产。

为国成仁——蔡桂光同学的忠烈事迹

蔡桂光同学，原为瑞安市飞云镇霞宕村人。1943年4月间，蔡桂光和我同时在丽水碧湖镇考入军训部西南干训班学生第九期第二队受训。他比我大四岁（23），曾有爱妻与儿子。他目睹瑞安两次沦于日寇的蹂躏下，毅然弃文习武，学会杀敌本领，为国争光。在受训期间不但成绩良好，而对我帮助尤大。因此，我尊敬他为亲兄弟一样；他待我也情逾手足。

1944年2月，我们两人未届毕业，即由教育长李默庵（黄埔一期）委派充任准尉分队长，到永乐师管区接收新兵，充实抗日力量。

同年4月，我俩共同完成了任务，回校接受新的教学，训练一个月后，就提前毕业了。我分发在陆军突击总队第二队司令部工兵连当见习。他派充第十营一连代理排长。

1944年10月份，我部奉命收复龙（游）、衢（州）时，蔡桂光同学被委令为正排长，从松阳境搜索前进，光复龙衢。因他机智勇敢，初战告捷，曾受总队司令李默庵，突二队少将司令魏人鉴传令嘉奖，晋升为中尉排长。蔡同学得到荣誉鼓舞，更加意志奋发，倍增猛勇，乘胜追击敌人至汤溪县上境山。迫使日寇逃回金（华）、兰（溪）老巢，不敢动颤。为了阻击日军再次出扰，他奉命担任前防警戒，排哨离敌仅千余米，处在敌机的盘旋下和炮弹的射程内。而他坚守排哨

岗位，同士兵吃在山岗，睡在哨兵壕里。

同年11月，敌人再次向浙东侵犯，利用密集炮火威胁汤溪我部阵地。蔡排奉命转移阵地时，为使全排安全脱离险境，他自己最后离开哨壕。就在这瞬间，一颗敌弹落在他身旁爆炸，当场牺牲！全排士兵奋不顾身抢回他的遗体安葬在上境的小山头。立碑以志（这时我已调七营三连代指导员）。我闻讯赶至十营时，悲恨交织，只得将他为国捐躯的情况告诉他家人。

1945年3月间，我部调回龙游整训。蔡父从春老伯赶到龙游，想把他儿子的忠骸移归故乡埋葬，得到全队官兵拥护。当时由我引见了司令魏人鉴、副司令朱则鸣。魏司令为晓喻军民，表彰英烈，亲笔为蔡同学书赠“为国成仁——蔡桂光同志精神千古”锦旗一面。并派我护送至瑞安原籍。沿途受到广大军民的尊敬和赞誉。灵柩运到瑞安湖岭区时，瑞安县城已第三次沦入敌手了！蔡老伯乃改雇竹筏沿河流运回故乡。

四十多年来蔡桂光同学的光辉形象，时而萦在我脑际激励我前进！我深信：“为国成仁”锦旗，将永远闪烁着烈士的亮节高风和英勇精神！

（童学杰供稿 陈刚整理）

血手写抗日 肩枪卫中华

怀念杨华林同学为国捐身躯

薛乐天

军校毕业了，雄纠纠气昂昂的踏上抗日前线，肩负起守土卫国职责。1941年秋天到了四十师118团充少尉排长。我师担任苏南溧阳高淳一线防务，面对金坛、溧水、句容敌人，守土职责重大。

1941年8月15日，“情报”消息：当面敌人调动频繁，有进犯我军阵地，掠夺粮食物资企图。这是日军常有的掠夺窜扰。我连防地是通敌要道。师长方日英命令“布防阵地，不许敌人越雷池一步，务须与阵地共存亡”。连长令各排修筑工事，随时准备进入阵地，堵击敌人。我为第三排随连部为预备队。营配有重机连，用火力的封锁交通要道，使敌人无法进入我连前沿阵地，严阵以待，等候敌军进犯。

8月16日拂晓，敌以炮弹及重机枪，用火力的搜索我阵地，我军沉着应付。待敌进入我有效射程，用轻重机枪交织好火网，力歼来犯之敌。敌我炮火，弹如雨点，硝烟飞扬。敌几次发起冲锋，皆被我军击退。第一排长韩锡聘（十五期同学）手臂中弹，奋勇的站立起来，指挥机枪射击，未下火线。连长令我排向第一排增援，我利用已筑好工事进入阵地，沉着指挥战斗，发扬机枪火力，使敌人无法冲入我阵地。那时连指导员杨华林同学乃十七期分发来的，不幸身中

数弹，当场击倒，光荣的牺牲。在这次激烈战斗中，营长孔令文率第三连增援上来，才挡住进犯敌人。营长鼻头也受伤。战斗一直坚持到下午犹在激斗，120团第一营增援上来，才将敌军击退。

这次战役，我军伤亡惨重，可是敌人死伤更大，而我阵地仍然屹立不动，敌人未越我阵地一步。我防线内人民，受生人命财产未受损失，得以安居乐业。我则初出校门参加激斗的一天，也是杨华林同学为国牺牲之日，追忆往昔，不胜感慨！

广丰的狙击战

阮西勋

一九四二年毕业前夕，三分校由瑞金迁移广丰后，六月间我们十七期学生二十二总队，奉命掩护第三战区长官部撤离，狙击广丰一带敌人的任务极为繁重。我们星夜急行军赶到阵地构筑工事。同学们初次上战场杀敌，兴奋异常，个个摩拳擦掌，巴不得早杀几个鬼子，方消去心头积恨。

日寇是沿浙赣路向我进犯。广丰一带是我军的主力防守线。我们二大队迫不及待的要完成布防工作。翌日，夜幕刚一拉开，远近隐约地可以听到敌人的枪声了。半夜时分，天空又降下了冰雹，敌人就趁这个更深漆黑、雷雨交加的间隙时机偷袭我阵地。拂晓，龟缩在拒马前线敌军被我们击毙之后，我方各山头阵地全面出击，追歼在逃之敌。由于同学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因而取胜神速——在短短时间里歼

敌近百名。我方伤亡只有数人（我班班长孟鼎坤负伤）。十八期独立第一大队同学林鹤松（瑞安仙降区人），同时在这次战役中右腿受伤。

满怀壮志 参军抗日

朱子珊 供稿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全国报刊登载：国民党南京军事委员会招考政训研究班第一期学员（即中央军校高教班第二期）。我立志应召考入该班受训。在校经过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正值日寇准备进攻占我冀东。南京军委会将我们这批快要毕业学员分发华北，成立“华北宣传总队”。由班主任刘健群率领赴北平军分会报到。

华北宣传总队，共分十多个大队。每个大队都有分配若干学员去东北军与西北军各师团担任政工宣传工作。我为第二大队队员。由大队长李秉中率领赴平津路郎坊车站六十七军王以哲军报到。该军辖107、110、117三个师，另辖一个炮兵旅。宣传大队下设三个中队，由中队长吴伯涛率领，我派在117师。师长吴克仁。师部驻地为冀东迁安县的一个小镇。各团、营、连则各驻守在前线——长城一带，经常与日寇有接触。

日寇占领我东三省后，我东北军撤至关内。部队官兵思想紊乱。有的倾毁家产随带全家人跟着部队走；有的家人离散，孑然一身背弃乡井。军风纪也很不正常：乘车不买票，

进馆子吃东西不给钱，借老百姓东西不给条子，也不送还人家。拉夫更是看成平常的事了！针对这种情况，宣传队对官兵们宣传军民团结一致抗日的道理。

宣传队另一个目的，教育士兵识字，宣传对日抗战意义；联络军中官兵感情。还时常派人去前线与官兵谈话、慰问；每逢纪念周讲解国内外时事；规定每天早晚升降旗；传达军民联系情况；讲解纪念历史的重要意义；组织壁报由各官兵自由发表意见，自行编排张贴。上级发下的各种报刊，给官兵阅读讨论；成立消费合作社，方便官兵自由买卖日用必需品，并开展俱乐部活动等等。对群众方面：借集会机会发传单、画报、贴标语及写墙报。

117 师所属部队的官兵都是东北籍人，想回家的思念很切。我们只好慰藉他们，鼓励他们奋勇杀敌，收复失地！

117 师撤至关内后，坚守长城一带。但我友军的阵地被攻破了之后，117 师阵地受到严重威胁，奉命后撤，宣传队也随军撤离。到了“何梅协定”（即塘沽协定）时，华北宣传总队改为政训处。各军师宣传队，都易名为政训处。我为 117 师六四八团少校团政训员，随六十七军移驻湖北孝感县整训。整训完成后奉命调至陕西省驻防。

陈 刚整理

编后语：这组资料系回忆记录整理。因离事件时间较久，追忆材料可能有出入。请当事人及有关人士指正。

光绪二十二年——二十八年

瑞安城内的学校

摘自《浙江潮》第四期调查全稿

中学校一所——普通学堂

课目（教习） 国文：蔡金营 伦理政法：杨绍廉
历史地理：池虬 物理数学：陈恺
英语体操：李驹儒 东文：许璇

干事 发起人兼校长：孙诒让 会计：项湘藻 孙诒泽
监 督：郭凤鸣 庶务：洪炳枢 洪锦濂
书 记：黄增祥

生徒 五十人

经费 常年经费四千元 支取分三部：
1、库串之加厘 2、种种之地方税
3、绅富之捐输

设立年月 丙申（1896）年初名学计馆，仅授算学，图绘
壬寅（1902）年 正月改为瑞安普通学堂
小学校五所
（皆分寻常高等二级）

一、东南隅蒙学堂

课目 国文 伦理 历史 地理 算术 图画（寻常学校
不设） 体操
教习 萧侃 邹响 宋景贤 项燧
干事 发起人 林猷梅 监督 项方昕
会计庶务 项毓芳 蒋作藻
生徒 四十人
经费出款 常年四百元 入款 绅富之捐输 亩产之提成
设立年月 壬寅正月（1902）

二、西南隅蒙学堂

课目 同上
教习 洪锦骧 柳凤池 郭凤丹 宋景楨
干事 发起人 洪炳铎 会计庶务 王恩植 李炳光
监督 池志徵
生徒 四十人
经费 同上
设立年月 壬寅（1902）年正月

三、东北隅蒙学堂

课目 同上
教习 吴孟龙 邵秉中 吴 纲
干事 发起人 孙诒让 黄曾锴
会计及庶务 胡锦涛 池 虬
监督 金 絨

生徒经费 设立年月同上

四、西北隅蒙学堂

课目 同上
教习 项廷珍 彭镜明 林 骏 管瞻洛
干事 发起人 饶方猷 吴之翰 监督 周之冕
生徒 九十人
经费设立年月 同上

五、速成公塾

教习 林 辮 李公亮 袁致中 金品彝 项燧
何 荪
干事 发起人 项骧 林政友
会计及庶务 项葆贤 监督 林孟沧
生徒 七十人
经费 捐募
设立年月 同上

女学校一所——女学蒙塾

课目 国文 历史 地理
教习 萧侃（亦陶）之女 萧仁果
发起人 萧侃
生徒 十人
经费 修金募集
设立年月 癸卯（1903）年正月

实业补习学校三所

实用学塾

课目	识字	拼字	作文	书信	笔算	珠算
	阅报	演说				
教习	洪锦骧	洪彦远	洪彦亮	许壬	蒋黼	蒋墀
	项廷珍	吴之屏	蒋建中	陈恺	管贍	奎
干事	发起人	许壬	庶务	洪炳镛		
	会计	王宗熙	监督	郑锡康		
生徒	八十人					
经费	捐集（杂费130元）		教习不支修			
设立年月	癸卯（1903）年正月					

工商学校

课目	同实用学塾					
教习	张洪钧	陈楚元	薛鼎畴	项极	唐	闾
干事	发起人	陈楚元	庶务	项方衡		
	会讨	项颂楨				
生徒	五十人					
经费	捐集					
设立年月	癸卯（1903）年正月					

商务学校

课目	识字	写信	看银钱	闽语	甬语
教习	徐玉鸣	杨育骏	李寅赛		

干事发起人 杨育骏

生徒 二十人

经费 修完募集

设江年月 癸卯（1903）年正月

会社之部

农学会（务农会）

组织 发起人 黄绍箕 黄绍弟 孙诒让 会员百人

办法 研究部 试验部

经费 集股五千圆

设立年月 丙寅（ ）年十一月

武备学社

组织 发起人 蔡会萱 萧侃 会员二十人

办法 研究部 操练部

经费 捐集

设立年月 庚子（1900）年九月

演说会

组织 发起人 孙诒让 孙任 林政友 孙衡

正会长 孙诒让 副会长 项湘藻

评议员 蔡念萱 林调梅 林政友 饶方猷

干事 孙任 林獬 孙衡

会员 五十人

听众 每期约千人

办法 演说分目 甲论说之部（一、德义上 二、知识上
三、实业上）

乙述告之部（一、历史 二、时白
三、新词 四、小说

注意下层社会，定期每月朔望

经费 捐募

设立年月 壬寅（1902）年十一月

（许世铮 供稿）

瑞安文人在外最近动态（续）

王宝舆 应第四次亚洲流体力学会议之邀撰写论文（英文），

他于1949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航空系，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流体力学研究所教授。

他孜孜于学，诲人不倦，一边教书，一边著书。1956年与其他同志合译《实验空气动力学》上下册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61年，与其他教授合编《飞行器部件空气动力学》上下册150万字，受到国内赞赏。在“文革”后期，开始研究张量流体力学，研究曲线坐标系下的气体动力学方程，推导得该方程组的特征方程及沿特征面的关系式。当时国外只推导得近似的特征方程关系式，所以引起国外重视，译为英文，发表在国外刊物。1983年美籍华人来杭讲学，讲授张量流体力学。在座谈会上，极力赞赏宝舆，为之惊讶。在校工作期间曾参加飞机及导弹的设计工作，因此被聘为《航空气动手册》主审。1986年，由他担任总主审的《航空气动手册》获航空工业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此外，他担任空气动力学研究会理事、《空气动力学》学报常务编委。亚、跨、超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工委航空气动力攻关办公室成员等。

亚洲流体力学会议，将于1989年8月在香港召开，宝奥应邀撰写论文（英文）。

曾衍霖出席第二届国际药物代谢学术会议

曾衍霖于1953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物系，即在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由研究实习员选升为正研究员。工作勤奋，孜孜于学，在图书馆、实验室，埋头伏案，废食忘寝。如有新的发现，即沾沾自喜。攻破了难关，欣喜若狂。他发表了重要文章58篇，分别刊载在国内刊物。有的，为国内第一篇介绍药代动力学的综述；有的，为国内第一篇介绍药物代谢产物动力学的综述。且在国外刊物或国际性学术会议上，用外文发表。如在国际药物学会联合会1981年年会上，西欧药物研究的权威刊物，国际药物代谢学会的机关刊物，荷兰药物学会的机关刊物等。

他曾赴荷兰的利定（译音）、尼摩其（译音）大学、英国的敏起托（译音）大学等校作访问教授。载誉归国后，应全国首届数学药理学术会议，及上海、浙江、广东、天津等地药学会之邀，作过多次报告，对国内学术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80年7月初，国际药理学会及中国药理学会联合在沪召开药物代谢工作会议，衍霖作为中方负责人，应邀在会上作了研究报告。外宾反映，认为已达国际水平。1988年5月17日至5月20日赴日本神武参加第二届国际药物代谢学术会议。中国药理学会理事会推举他参加第五届东南亚与西太平洋地区药理学家大会。

张树云 以版画名家在日本讲学並將举办画展

张树云现任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版画协会副会长，是中国现代版画江苏水印木刻学派创始人之一。其版画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全国版画展览，由国家选送日本、苏联、巴基斯坦、法国、美国、丹麦、南斯拉夫、朝鲜、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出，並广为国内外美术馆、博物馆、艺术大学收藏。部分作品被编入《十年来版画选》、《浙江版画五十年》、《江苏美术作品选》、《江苏水印木刻选》、《现代中国版画》（日本出版）《近代中国的版画》（日本版画报）等画册。他在国内外多次发表版画作品与论文，代表著作有《中国现代版画史概述》、《鲁迅与中国现代版画》、《鲁迅の创作木板艺术）正论を》、《中国水印版画的变迁中发展》（日本版）他的作品被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编入大型的《美术辞书》、《美术辞林》列为美术家卷中名人条目。他历年来发表的，关于美术方面言论与见解，被吉林人民出版社编入《现代美术家画语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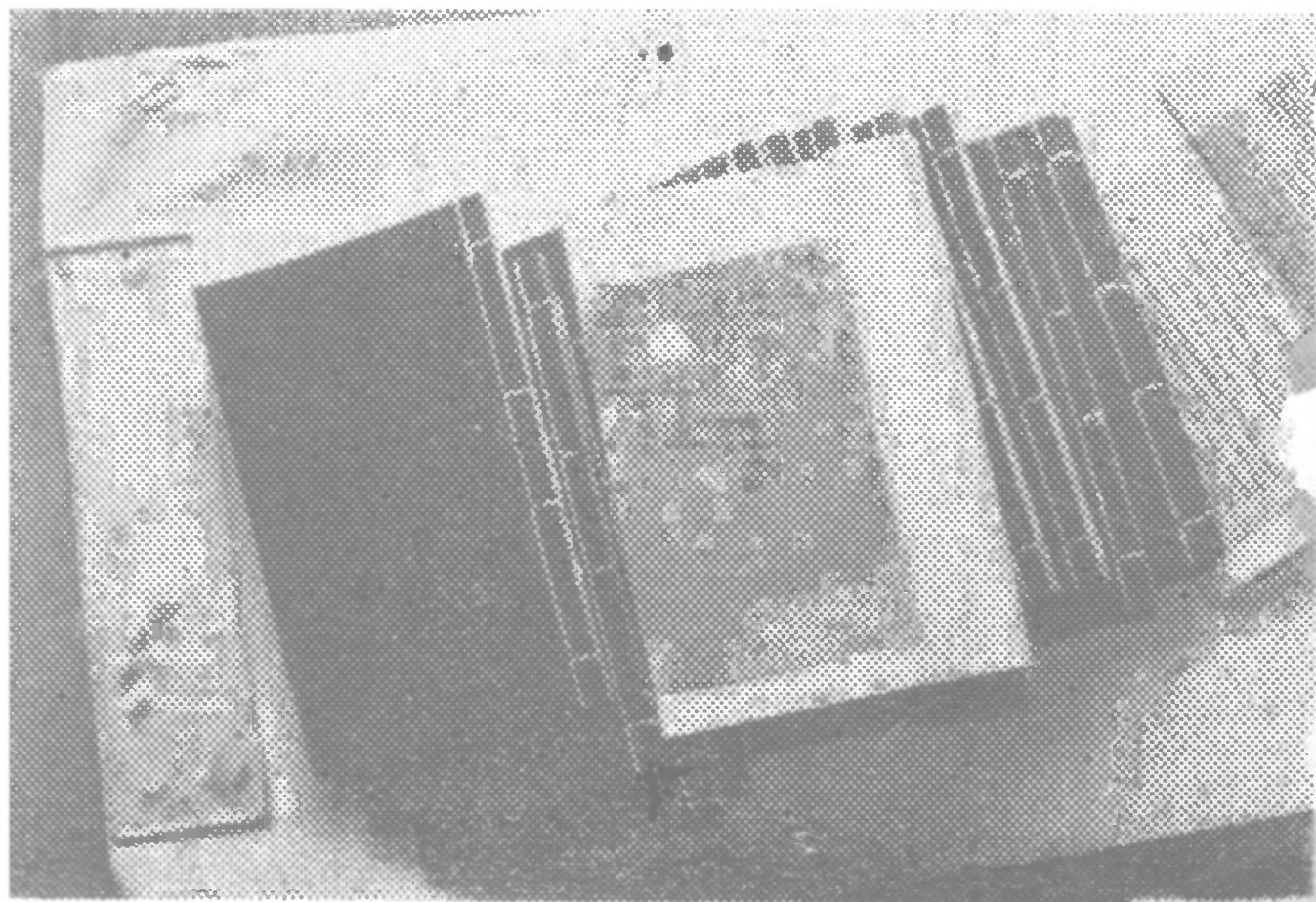
他于1986年11月应日本国爱知县立艺术大学邀请讲学。讲题是《中国水印版画演变与发展》全文在日本发表，备受听众欢迎，予以很高评价。又将于今年在日本东京都稻市，举办个人版画展览，日期在联系磋商中。

黄本诚赴美出席国际真空学术会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黄本诚壮岁就读于邑之瑞安中学，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参加我国航天科技战线。工作不久，即从研究国际卫星发射情况中，认识到要想加快航天事业的发展，研制出我国自己的大型宇宙模拟器，是必不可

少的前提。由于他与其他同道者深入研究，艰苦不倦地工作。终于1984年4月19日成功地发射我国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它满载了十亿人民的豪情，飞上了三万六千公里的云天外。它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了当代宇宙航空技术中的精华，成了世界上有数的几个能够独立发射通信卫星的国家。被称为“航天事业的顶梁柱”。

黄本诚並不以此为满足，再接再厉，更深入地钻研，卓著成绩。于今年三月飞往美国旧金山，出席国际真空学术会议，並作学术报告。（待续） （超）



赵钧《过来语》手稿封面

K 295.50381

HA



1.00